

公认的探讨动员风波的一个有效工具。它的确是一种追踪特定类型事件随时间起落兴衰的方法。附录 I 和附录 II 详细讲述了推演事件数据的方法，供读者参阅。在此处，我将对使用这一方法的合理性以及事件数据的科学性做一简短的讨论。

公开化期间是一个紧缩的暴风骤雨时期，革命叛乱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它就是我所定义的“浓缩历史”（thickened history）——在这一时期，事件超速升级且前后之间强烈地促动发展。报纸每天都会披露以前被隐匿的历史事实。每天都有许多，有时是数以百计的示威、罢工和大众暴力事件撼动着苏联。而且，这一时期，发生的制度变化让人眼花缭乱。正如一名社会运动激进分子后来对 1989 年情形的描述：“欧洲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有过如此密集的运动。”¹ 时间敏感性（time-sensitive）方法被用来解开这一压缩的历史，并将其放入更大的时间和空间情境中。事件分析可以做到这一点。

在政治高压时期，或在一个很少根据信念行事的环境下，很难从公共行为中辨识内在认同。在政治剧变时期，研究者面对的问题就会不同，公共信念转换的如此之快以致于无法把握。这一环境下，公共民意测验只反映某一时点的情况。² 即使测验重复实施，测验专家也很难设计出收集巨变中的公共态度的系统性问题，因为曾藏于政治层面之下的主题在此时开始变得清晰，民意调查实践也受到正在发生的社会变迁之无序实践的影响。在前苏联的案例中，1987 到 1991 年之间，没有一项系统性测试是关于苏联公民对苏维埃政权是否应该存在的态度变化的。直到 1989 年 8 月，才有第一项全国范围内关于苏联人民对苏联政体分裂态度的调查。民意调查专家（西方和苏联）认为这一调查在当时是无法获得有效结果的，因为政治变迁过程就包含了态度的变化。我曾努力系统地搜集这一时期相关的调研信息（大部分都找到了），但是此类离散的、无序的民意记录只是那个时期的一些定格照片，不能全面反映革命情境中政治态度的动态变化。

相对而言，事件分析是一种研究急剧变迁历史的有效方法。事件分析的优点在于它具有动态性和时序性。它能帮助我们辨识特定形式集群行动所处的社会情境，并有助于我们确定此类行动的关键时刻以及起落兴衰变化的过程。尽管事件数据不能测量其中的观念因素，但它有助于我们洞察特定时刻群众的心理态度及其变化规律。确实，许多民族学者关注的理论议题都可被理解为动员的时序问题，群体动员的前后连贯性，过去发生的抗议风波与正在研究的抗议事件的关系，都是影响特定群体是否采取行动的重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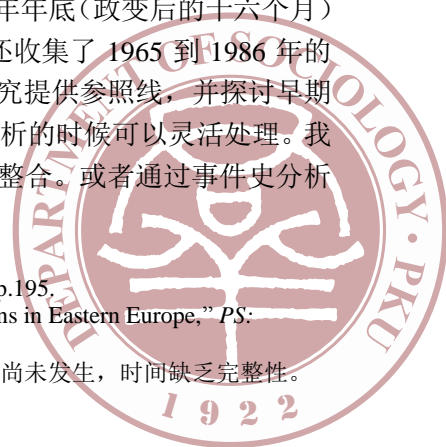
通过事件分析，我系统地收集了 1987 年 1 月至 1992 年 12 月以来 6663 项抗议示威和 2177 件群体暴力事件的资料，以此重构了那些致使苏联解体的动员风波。示威构成了当年大众挑战苏联多种形式中的一个层面。然而，这一时期最为普遍和显著的抗议形式，它们恰好反映了政府和挑战者之间关系的变化。此外，我收集了当时的罢工信息，但是这些并没有与示威分析的结论相左。这一时期的大众暴力也是动员的一个重要层面。它在理解形塑民族主义暴力和非暴力表达的因素中是有价值的，并倾向于关注大量的新闻资源，有助于事件抽样分析的相对准确性。

本书所用信息并非公开化动员圈的一个完全同质的再现。但是，在附录 II 的明细中，从各种时间记录的数据检验中有理由相信这是一个精确的近似值，而且这确实远远超越了同类研究。尽管苏联解体是在 1991 年 8 月政变之后，但我却把研究扩展到 1992 年年底（政变后的十六个月）以避免右删节问题³，并以此研究解体对动员模式的影响。另外，我还收集了 1965 到 1986 年的 185 次示威和 50 件暴力事件，以便为公开化时期抗议动员的发展研究提供参照线，并探讨早期抗议模式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事件数据的一个好处是在它们被分析的时候可以灵活处理。我们可以按照特征、发生地、诉求类型、周、月或其他标准来进行分类整合。或者通过事件史分析把数据进行分解或检验。这一灵活性保证了研究结果的可靠性。

¹ Boris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A Soviet Chronicle* (London: Verso, 1990), p.195.

² Sidney Tarrow, "Aiming at a Moving Target: Social Science and the Recent Rebellions in Eastern Europe," *PS: 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 (March 1991), pp12-20.

³ 【译注】右删节：统计技术事件史分析的基本概念，意为在观察期结束时事件尚未发生，时间缺乏完整性。



事件数据的重要性体现在，它建立在成千上万抗议事件的详细描述的基础上，它也提供了一套嵌入性过程分析策略的定性研究，便于我们通过记者和目击者的记述来更加深入地研究特定重大事件。如同大多数事件分析，我主要依赖出版物构建数据。检索了 150 多种不同的新闻资源（附录 II 有全部资源名称列表）。此外，我充分运用了运动领袖和政府官员的回忆材料，参与者访谈的出版物，见证者的口述史，以及西方和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之后关于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文献。

我的目的不是撰写一本关于苏联解体的历史著作。虽然我相信这一分析将会揭示某种被大多数同行忽略的特定历史过程，但是我认为这一任务早被其他人充分完成。我的主要目标在于，利用苏联经历考察民族主义运动中的结构与行动随时间变化的相互作用过程。我已为此选择了相应的主题和案例。我对民族主义运动“平静期”的分析相对较少。读者不应该因此而认为“平静期”对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不重要。相反，我在前文列出的理论观念和在本书中提供的经验材料强调了这一阶段在解释民族主义抗议“喧闹期”所发生的各种现象具有极度重要性。然而，篇幅的限制，以及我力图解释民族主义抗议“喧闹期”所发生的现象的焦点目标，限制了我对“平静期”发生的那些直接对民族主义运动高潮期产生重要影响的各类事像的分析。

引导人们重新审视民族主义和苏联解体，避免实在说、决定论和还原论，采用一种强调时序、交互作用、行动的理解方式，我的目的是：理解民族主义运动的起落兴衰为什么发生在历史上的特定时点；讨论政治中的内隐冲突变成外显行为的条件，以及认同转变的条件和环境；探索一个民族主义行动如何影响另一个，这些行动间歇性地推动民族主义运动浪潮，最终改变了国家体系的面相；并强调民族主义研究中形式和内容具有同等重要性。最后，我希望，这一研究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在某一情境下某一事件的发生“表面上看去不可能”，如何变成了“看来似乎不可避免”。

【译 文】

民族主义浪潮和动员周期¹

《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第二章

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著，李汪洋译²

所有历史经验都证明了一个真理：可能之事皆不可得，
除非你执着地寻觅这个世界上的不可能之事。

——马克斯·韦伯，《以政治为业》

并不是所有的历史时代都是相似的。在一些年代，变化发生得如此缓慢以至于时间似乎都静止了，纵然这种表象之下大量动乱和演化有可能正在悄悄发生作用。在另一些年代，变化发生得如此急剧、喧嚣、根本，以至于几乎不可能采取相应的措施。

¹ 本文为马克·贝辛格（Mark R. Beissinger）著《民族主义动员与苏联国家解体》（*Nationalist Mobiliza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State*）的第二章（Chapter 2, The Tide of nationalism and the Mobilizational Cycl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第 47-102 页。

² 译者为北京大学社会学系 2010 级硕士研究生。



苏联历史的发展规律即是如此。当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1982年11月去世时，苏联历史仿佛立时静止了，特别是考虑到前三十年曾震动苏维埃国家的剧变。受斯大林统治影响，稳定和常态的指导精神成为苏联数十年间处理绝大多数社会问题的准则，甚至是在族群关系这一复杂领域。

随后，在1986年末，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USSR）取消了长期执行的限制言论自由的规定。法国大革命并非以民族或阶级斗争开始，却最终发展成为上述两者。¹ 同样，开放（*glasnost*）政策的实施并非以民族主义大爆发为开端，但却引发了民族主义的大爆发。正如一位爱沙尼亚社会学家后来所指出的那样，“当改革（*perestroika*）开始时，无论是它的总设计师，还是社会大众，都没有对可能出现的民族运动做好准备。”² 民族主义的第一次重要爆发，直至开放政策实施1年半后（即1988年2月的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的冲突）方才发生，而且，这与最终导致苏联解体的分裂主义问题无关。

在1988至1989年间，政治议题日益从政府机构转向街头巷尾，而且，一旦被有效地进入社会底层时，这些已出现的民族主义议题便会立刻将自身推入政治领域的范畴。当其他群体紧随某一群体成功向现行体制发动挑战并持续推动更深层次挑战时，大规模民众动员便同时将许多族群囊括其中。根据开放政策所蕴含的自由化与改革的精神，最初，绝大多数民族主义动员都紧紧围绕自由运动、加强自治权、语言与文化表达的需求。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新民族主义运动的需求开始受到日渐增强的政治野心的影响，在许多情况下与争取独立和分裂国家的要求相联系。涉及成千上万人的大规模游行示威在不同地区纷纷出现。当时，一位苏联记者如此写到：“集会、游行示威。游行示威，游行。……下一周再循环往复。有时候似乎整个国家都在举行同一场集会、同一个游行。”³ 到1989年秋，反对苏维埃国家的民族主义抗争已经发展至苏联在东欧的加盟共和国，并以惊人的速度摧毁了当地的共产党政权，宣称这些国家拥有独立于苏维埃帝国的国家主权。反过来，东欧共产主义的终结也进一步把民族主义抗争扩展到苏联全境。不仅历史“加厚”（*thickened*）⁴，而且某一情境下的动员结果也影响到下一次的动员行动。于是一股强大的民族主义浪潮出现了。

这一章主要介绍开放时期的民族主义浪潮以及它作为重要组成部分的动员周期，并探讨如下一系列问题：民族主义浪潮最初发生的原因和方式？动员周期内民族主义争端地点的演化？这一争端对苏维埃政府制度连贯性的影响？我认为某些类型的国家更容易产生民族主义浪潮，具体来说，就是那些具有族群多样性、各族相对聚居、文化实体的大型多民族国家。特别是当它们正处于政权危机时，这一特征更为明显。在苏联和俄罗斯事例中，政权危机导致了20世纪某一阶段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并伴随着不同的后果。戈尔巴乔夫的苏联自由化政策及其所导致的苏维埃国家中央体制中日益增加的冲突，带来了一系列新兴的挑战性行动。而且，这些行动还因政权实施以往常规类型的镇压的失败而增多。

在这一章，我力图展现出民族主义浪潮是如何从更宏大的动员周期中产生，并迅速掌控自我的发展路线。民族主义之外的其它类型的动员——包括民主化、劳动和经济事务以及环境正义——也包含在周期之中，并构成了动员的自治载体。它们有时与民族主义问题相联系，有时又与之相分离。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民族主义获得了其它潮流所没有的一股特有的力量和势头。正如我们将在后文看到的那样，作为开放时期动员周期中的主导性力量，民族主义的兴起更是既存结构性条件、制度约束和事件具体进程之间的互动。随着制度约束的减少，挑战性行动就会增多，而且一个群体成功的民族主义动员会激励其它群体通过类推和仿效努力去做同样的事情。终于，

¹ Michael Mann, *The Source of Social Power*, vol.2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p.167.

² K. S. Hallik, quoted in *Pravda*, June 7, 1989, p.2.

³ *Izvestia*, February 22, 1990, p. 1.

⁴ 译者注：主要指事件发生的频次增加，在同样的时间段内发生更多的事件，仿佛历史被“加厚”了。



当挑战性行动取得它们自己的发展势头时，它们会逐渐摆脱制度约束，甚至开始转变那些曾起阻碍作用的制度的特征。这些自治事件在它们自身的因果结构中占到更大的分量。最终，争端行动逐渐正常化，并构成了一股广泛的民族分裂主义浪潮，而这一浪潮会根据自身的发展逻辑在重要方面不断推进。

历史背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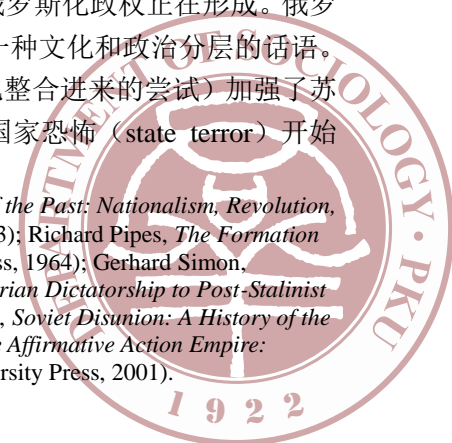
在民族领域内，苏维埃国家的历史是由争端频发阶段和相对稳定和平静阶段共同组成的。到1918年春，沙皇政权垮台、布尔什维克掌权之后，俄罗斯帝国由于种种实际目的而不复存在。在当时，布尔什维克只是控制了俄罗斯的中心地区。帝国的其它地区仍然掌握在其对手白军或一系列力量弱小的民族主义运动和那些宣布独立的原政府手中。不到三年，即1920年末，通过残暴的武力、布尔什维克的动员能力、民族主义运动及其政府的弱点，以及共产主义对于高度自治的承诺等各种手段的综合运用，俄罗斯帝国的大部分土地重被联合成为一个单一的政治形式。

在74年的历史中，苏维埃国家做出了大量而有力的努力，使多文化人口拥有一种不同的民族观。苏联宣称自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而非一个单一民族国家或帝国。尽管普遍使用高压统治来解决多族群性所带来的挑战，但是苏联统治者始终努力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公民之中构建一种政治和文化忠诚的公民形式，以及一种爱国主义和共享的政治认同的情感。苏维埃政权并不仅仅只是占据领土，同时也做了更多的工作。在多族群人口的背景下，它极尽所能奠定自身的社会基础，并培养对同一共同体的归属感，即在从事一种**特定类型的民族建构**工程。但是，自成立以来，苏联便被“谁的国家？”这个棘手的问题所困扰。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答案在不断地变化，但却总是间断的、模糊的，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有争议的。¹

当1920年代中期最后一次公开分裂主义残余被严酷镇压的时候，苏维埃政府逐步推行少数民族的文化自治，以此将非俄罗斯人也整合进政治秩序之中。通过族群联邦制度，苏联承认并接受了将**多族群性**作为社会和政治生活的一项指导原则。全体人口被正式划分为具体的民族群体，并且诞生了一系列以族群为基础的族群地区单位。此外，还在政治领域内鼓励本族语言教育和文化表达。通过本土化 (*korenizatsiia*) 政策，非俄罗斯人逐步掌握了地方政治的领导权，并在莫斯科具有某种程度上的正式代表。苏联统治者将领土、政治代表、文化能力视为将少数民族整合进苏联政治共同体的必要手段。然而，这些所希冀的实践最终被一种对革命性跨民族国家的普遍忠诚所替代。无论如何，到1920年代末，这些被承认的政治和文化空间为增加了的民族主义表达提供了机遇，并最终导致共产党内部文化冲突日渐增多，特别是在斯大林主义领导下，将一种现代性和社会组织的单一模式强加给社会。

尽管1920年代有上述针对文化差异的调整性举措，苏维埃政府从未彻底摆脱以下认识——多元文化政策背后仍是一种必要的俄罗斯人统治。从1930年代中期到1940年代，在斯大林肆无忌惮的暴力行动及其偶尔遭致的反抗中，一种非正式但更为明显的俄罗斯化政权正在形成。俄罗斯化的多族群政治精英，倾向于不相称的俄罗斯表达，并开始接受一种文化和政治分层的话语。对波罗的海各国、西乌克兰和比萨拉比亚的有力整合（以及将芬兰也整合进来的尝试）加强了苏维埃政权与沙皇帝国之间的联系。作为解决民族反抗的一种方式，国家恐怖 (*state terror*) 开始

¹ 关于苏联（所谓的）“民族问题”的历史，详见 Ronald Grigor Suny, *Revenge of the Past: Nationalism, 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Richard Pipes, *The Form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1917-1923*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4); Gerhard Simon, *Nationalism and Policy Toward the Nationalities in the Soviet Union: From Totalitarian Dictatorship to Post-Stalinist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Bohdan Nahaylo and Victor Swoboda, *Soviet Disunion: A History of the Nationalities Problem in the USSR* (New York: Free Press, 1989);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 1923-193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被广泛使用。然而，这种朝着更严重的族群分层、高压统治、帝国合法化的转向同样也具有间断性和模糊的特征。即使在赞扬俄罗斯的高度上，俄罗斯人仅仅被视为“兄长”而非征服者，俄罗斯民族主义更是满足于掌权者统治需要的一种隐性工具而非苏维埃政府的一项指导原则。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一样在专政者的暴力统治中遭受了很多压制。而且，尽管有数以百万的人死于种族灭绝政策，但是，这种强制措施主要是国家恐怖的内在逻辑，而并非是针对少数群体的目的性迫害。¹

在整个斯大林统治时期，少数族群在族群荣誉的表达上受到了极大的阻碍，而到末期，更是被严厉镇压。但是，在斯大林主义统治下，同化并不认为是民族建构的主导性模式。相反，双语能力（俄语作为跨民族交流的语言）被视为培养共有的政治认同的主要手段，而且，这一认同是凌驾于个体与族群的固定联结之上的。这被认为是一种生物性的而非文化的现象，同时也被正式作用于每一个个体，并应用在新护照制度中。尽管试图降低独立的政治表达、严厉压制传统的宗教和社会制度，斯大林仍然认定要对文化差异采用一种政治上约束的自治。尽管如此，到斯大林去世时，族群联邦体制已发展至这样一种境况：每个区域的科层制已经将当地群体所拥有的文化和政治资源类型结构化了，而那些没有族群联邦区域或远离这些区域单位居住的少数族群不再被认为应当拥有它们在苏联早期所提供的文化权利类型。作为主导性文化群体，俄罗斯人是唯一的例外，享有不同于其它群体的文化特权。迁移和人口移民安置被斯大林作为规范苏维埃控制的手段频繁使用，而这实际上也意味着将土地、工作、财产和住房转移到俄罗斯人和那些忠于统治秩序的非俄罗斯人手中。

在权威严重弱化阶段，例如斯大林主义政权濒临垮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族群关系正处于严峻的挑战之中。在战争时期，许多非俄罗斯人仍然忠于苏联，支持红军来抵抗德国的侵略。但是，其它人则选择放弃这一支援，特别是在合并不久的波罗的海各国和西乌克兰，也包括克里米亚半岛和北高加索地区（在这两个地区，尽管仍是少数，但许多人支持民族主义运动都与德国人有关，甚至有时就是由德国人组织的。）苏联对希特勒的胜利不仅阻止这一趋向，而且苏联也因此成为世界主要力量之一，围绕苏维埃国家营造出一种活力与成功的气氛，从而在俄罗斯人和非俄罗斯人中培养起对苏联的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认同感。正如梅厄·范塞德（Merle Fainsod）曾指出的那样，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成功或许是促使绝大多数人服从于苏联统治的唯一最重要的因素。²

由于斯大林的逝世，苏维埃政治开始了一段面向稳定化和规范化的长期发展阶段。尽管政权依然继续压制挑战主导性民族秩序的公共表达，但大规模恐怖已不再作为社会变迁或民族建构的一种手段被使用。分裂主义思想主要存在于苏联社会的**边缘**。在像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这些刚刚被合并而更难以驾驭的地区，采用游击战来反抗苏联统治的斗争一直持续到1950年代。但即使在这些地区，到了1950年代末、1960年代初，分裂主义在很大程度上也已经退化到看似不可能了。挑战族群关系的机会不断减少，而苏维埃政权所建立与强化的一套话语架构则明确宣称苏联已经“解决”了族群问题，并建立了“一个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Sovetskii narod*）。正如研究族群问题的一位苏联专家后来所说，“实际上，族群关系不再被批判，而被视为一个充满和谐的领域。其中，所有与和谐不符的因素都被剔除了，并被污蔑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表现。”³ 苏联超级大国的国际性胜利强化了非俄罗斯人对苏维埃国家的认同。苏联甚至认为应当将其自身

¹ 最近的例外是1943-1944年针对所谓的“受罚的人民”而发起的国家恐怖和种族大屠杀运动。基于大规模移民安置项目中有大量人口死亡，苏维埃政府试图摧毁这些人在本地生活过的所有证据。他们都被放逐到苏联边远地区的特殊监狱，文化机构也一并被废除。这主要是为了将对苏维埃政府的民族反抗局限在边远地区，并且为他们所谓的与希特勒军队的合作而惩罚他们。

² Merle Fainsod, *How Russia Is Ruled* (rev. ed.)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113, 291.

³ E. Bagramov, in *Pravda*, August 14, 1987, p.2.



作为其它多文化国家的一个模板被仿效。

苏维埃政权对其境内的非俄罗斯居民也带来了深远的文化影响。在苏联解体之后，流行一种说法，声称苏联人民从未有过一种所谓的“苏联”感。然而，在独立后的最初几年，乌克兰人、亚美尼亚人、摩尔达维亚人、哈萨克人、白俄罗斯人普遍有着支持重建一个苏联的强烈想法。显然，正如苏联最终解体所宣告的那样，苏联认同并未深刻嵌入于大多数非俄罗斯人的心中，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完全不存在。苏联政治理论强调人们可以同时忠于苏联和自己所属族群，而且，它宣称二者并不相互排斥，作为一位优秀的拉脱维亚人和一名忠诚的苏联人之间不存在任何矛盾。许多拉脱维亚人显然并不认同这一说法。但是，对绝大多数非俄罗斯人来说，他们从未面临在忠于苏联秩序或忠于自身族群认同之间做出选择的机会或必要。除了那些在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活跃在政治边缘、不断被逮捕和骚扰的政见不同者之外，绝大多数人都认为进行这样的选择是绝不可能出现的事情。

从表面上看来，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民族秩序相对稳定。正如之前所指出的那样，外部观察者无比确信这一政权的基本稳定性和**苏联解体的不可能性**。分裂主义思想在地区上看起来过于集中在波罗的海和西乌克兰地区，在政治上过于边缘化而难以构成一种威胁。苏维埃政府所使用的高压统治手段使得族群抗争看似毫无用处。此外，俄罗斯人与苏维埃政府之间的联系也排除了它成功举行分离主义运动的可能性。苏联领导者看起来更倾向于一种细微调整和适度改革的道路，而非那种有可能导致族群反抗的普遍性控制措施。¹

然而，在日常生活实践中，文化冲突普遍存在，而且在1970年代到1980年代期间看起来更加突出。扩散的争端发生在如下一系列问题之中：文化与语言表达、宗教自由、从政治强制放逐地返回家乡的权利、工作中的歧视、联邦亚单位之间的投资分配、精英职位上的族群代表、迁移的权力以及联邦亚单位的疆界等。俄罗斯统治的话语近年来变得越来越微弱了。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开始质疑俄罗斯人是否从苏维埃政权那里获得一个主导群体应当期望的利益，而在部分地区，本土化再次成为人们在政治领域内的期望规范。近年来，政府培养双语能力甚至是语言同化（特别是在非俄罗斯斯拉夫语系的人口中）的努力在不断减少，从而为后来开放时期文化复兴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但是，非俄罗斯人的民主与语言活力的模式日益加深了人们的质疑：苏联政权是否有能力实现全民流利使用俄语，从而将非俄罗斯人整合进一个共同的认同群体之中，至少是那个历来所设想的共同体。当然，当今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来说都是多元文化的，而且所有这些国家都存在着族群分层。尽管在改革前夕苏联民族问题呈现出严峻性和复杂性，但对绝大多数观察者而言，那时的苏联民族问题的确很大，但并不是不可能解决的。

以上就是1985年3月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当选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时的情形。几乎没有人相信苏联正处于最终将会导致苏联解体的民族危机之中。所有这些因素——刚性的政治体制、经济的衰退、阿富汗战争的僵局、两年半内三位年迈领导人的逝世，政治精英中普遍出现的腐败和丑闻、社会中日益加深的隐忧和愤怒——都使外部观察者和苏联官员中的年轻一代坚信，借用戈尔巴乔夫的话，“危机即将到来”²。但是，全体苏联精英和绝大多数外部观察者都不曾认为这实质上是苏联民族关系的一次危机。的确，对苏联民族秩序稳定性的信心，

¹ 从1965年到1986年之间，苏联所发生的185次100人以上参与的大规模游行示威中，只有20次提出了分裂问题，而且所有这些都发生在波罗的海地区。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977年10月10日在维尔纽斯的事件，发生在一场足球比赛之后，大约有10000到15000人参与其中。Ludmilla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Contemporary Movements for National, Religious, and Human Rights* (Middletown, CT: Wesleyan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71. 在1987年8月之前，仅发生过4次规模超过1000人的分裂主义游行示威，分别是1972年5月18日，考纳斯；1975年11月1日，维尔纽斯；1980年10月1日，塔林；1980年10月26日，特拉凯和立陶宛。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西乌克兰，小规模的分离主义反抗行动和地下民族主义组织普遍存在。但是，这些反抗行动多是极其分散的。

² Mikhail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Moscow: Novosti, 1995), p. 207.



正是戈尔巴乔夫努力进行苏联改革和决定实施开放政策背后的一个基本假定。

这并不是说并不存在导致苏联容易出现民族主义浪潮的大型结构性条件。相反，正是存在特定原因，这一浪潮才在苏联不是在其它地方产生并发展。苏联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危机极其深远，并且也体现在民族领域。斯大林主义对多群体进行高压统治的合法性及其对文化表达的限制——二者同样也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话语受限领域——对许多人来说是产生不满的一个潜在来源，特别是在知识分子阶层看来。通过全面认识苏联海外势力所及的外部争端和政权本身形式与特征的内部争端的后果，我们发现，苏联作为一股世界力量的野心也进一步加剧了它产生民族主义浪潮的弱点。¹ 而且，在苏联，国家与社会主义政权紧密融合。这主要是因为这一多族群国家是通过社会主义政权建立起来的。因此，导致挑战政权的政治开放政策很有可能带来国家事务的政治化。² 这种政权与国家之间的联系（对许多苏联公民来说，这也是难以区分的）绝非苏联的专利，而是世界上公民多民族政权的典型表现。许多这样的政权往往被视为多民族帝国，缺乏一种超越族群的、对国家更高层次的忠诚和认同感。特别是在政权危机时，这一情况更为显著。事实上，这已经成为那些具有多样性、聚居、文化实体特征的大型多民族国家所面临的危机，而这一危机最有可能导致民族主义浪潮在现代间断性的出现。开放时期并不是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席卷欧亚大陆。在 20 世纪，俄国及其继任者苏联的多群体都发生过类似的民族主义动员浪潮，分别是 1905 年、1917-1920 年和 1941-1944 年。其中，由于这些阶段都处于战争或革命时期，国家权力始终承受着沉重的压力。

尽管苏维埃国家在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危机中的作用颇受指责。国家和政权之间的融合、多群体中潜在的族群不满、苏联的海外扩张等，这些因素依然还不足以解释苏联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所有群体在斯大林主义时期都遭受了这样或那样的磨难，面临着文化表达上的限制，以及相同的国家危机和国家与政权之间的融合。这些因素有助于解释苏联为什么更易于产生民族主义浪潮，但是它们还无法解释究竟发生了什么——构成民族主义浪潮的具体行动，它实际上是如何发生的，它采取了那些政策将这一浪潮进行到底，以及它在开放时期席卷整个苏联社会时所带来的剧烈变化。结构尚不足以解释苏联的解体。这些因素本身还无法将不可想象变成不可避免，将几乎没有认为苏联解体可接受或可能发生——即使在认识到这些因素存在的情况——变为现实。正因为如此，人们必须反过来去探究开放时期政治开放促使挑战性行动在社会多个领域内爆发的方式。

从制度到街道

鉴于如下所述，1985-1986 年间，在苏联社会重建统治环境颇为困难，而这促成了戈尔巴乔夫推行苏维埃政治自由化的决定。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描述他当选总书记前夕的情形时所说：

国家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远远超过了它们被解决的速度。管理形式和方法中的保守与不足，工作干劲儿的缺乏，官僚主义的滋生等，都对我们的事业造成了巨大的危害……这一情形需要改变。但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地方都存在一种心理，即试图在不改变任何事情背景下改善现有情况。³

在戈尔巴乔夫当选之前，苏联年轻一代官员中就已经出现了一股不安的情绪。“所有的事情都已经变得腐化”，“我们不能以这种方式继续下去”，“社会必须改变”……正是这些私人话

¹ Seweryn Bialer, *The Soviet Paradox: External Expansion, Internal Decline* (New York: Knopf, 1986); Jack L. Snyder, *Myths of Empire: Domestic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Ambiti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1)

² Valerie Bunce, *Subversive Institutions: The Design and the Destruction of Socialism and the State*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³ *Pravda*, February 26, 1986, p. 2.



语为戈尔巴乔夫实施开放政策之前一个又一个的方案报告奠定了基调。¹然而，这些对现存国家事务的精英主导型批判本身很少关注民族领域。

在当选时，戈尔巴乔夫以及其他一些人的思考中已经有了一些模糊的认识，包括：社会应当更多地融合进政治进程之中；如果苏联打算克服“前危机”情形，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必须进行重大改变。²然而，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所承认的那样，当开放政策最早在1985年夏作为一项纲领被提出来时，它的主要目的并非是自由化，而是“去除阻碍发展的一切事情”³。这些举措声称旨在根除经济中的不当管理和腐败现象。在这一时期，戈尔巴乔夫还推行了一场臭名昭著的反酗酒运动（它也在苏维埃政府破产中起了推动作用），而大清洗也开始席卷共产党的各个机构。此外，一场旨在加速经济领域内科学和技术创新的运动也在进行。同时，戈尔巴乔夫开始要求经济中“激进的改革”；根据他的观点，这将最终发展成为一种类似于市场社会主义的形式，包括制定价格的自由化、将生产设备的所有权直接转让给被雇佣者以及给予私营企业的一些有限的发展空间。戈尔巴乔夫在反思开放早期时说到，“我们谈论的不是革命，而是如何改善这一体系。而且，我们相信这是有可能的。”⁴但是，直至1986年春，戈尔巴乔夫对于政治与官僚体制中的磨洋工现象（foot-dragging）以及苏联社会中对其改革真诚的普遍怀疑而感到日益失望。正如他后来所指出的那样，1986年3月初

改革政策遇到了巨大的阻碍，而许多人视之为将会耗尽自己的最近一场运动。我们有必要打破这些怀疑，使人们认识到这一路线的必要性。这就是提出开放政策的原因。⁵

这一旨在将社会置于改革进程之中的路线在1986年夏诺尔诺贝利核事件（Chernobyl nuclear accident）之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最初，党和国家向公众隐瞒了诺尔诺贝利核事件的严重后果，而这也在政治局内部引发了一场关于官方机密范围的讨论。⁶

正如戈尔巴乔夫最亲密的顾问所说，“传统的和‘列宁主义的思想体现在戈尔巴乔夫有关开放的最初认识中’。他最初将开放政策理解为“有助于党进行教育宣传工作的工具，是官方所宣称的改革先驱——目的在于‘使人民意识到新的政治路线’”。⁷1986年6月底，戈尔巴乔夫在一次与作家的会议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开放政策的问题。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中，他又号召通过地方立法机构的民主化使公众活跃起来，并赋予他们真实而非虚幻的权力。⁸到了秋天，争取苏联艺术家协会领导权的一系列斗争发生，并最终导致了1987年1月废止审查制度的决定。新闻界能够更加公开地发表言论。1986年11月，被流放到高尔基（Gorkii）这座封闭城市的安德烈·萨哈罗夫（Anderi Sakharov）也被释放了。这是政治开放的一个明确信号。在1987年1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的一次重要讲话中，戈尔巴乔夫第一次公开宣布了“民主化”的新政策，号召在党和国家机构中试验性地引入竞选机制。不久之后，大批政治罪犯从苏联监狱中释放出来，曾被禁止的电影和文学作品开始频繁出现，新闻界纷纷涌进先前“被禁的领域”并填补官方历史“空白点”。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当时政治局内戈尔巴乔夫的同僚们公开反对自由化的新方针。在1987年，戈尔巴乔夫并不认为开放就意味着丧失了对党的控制，而视之为党实施控制方式上

¹ 见 A. S. Cherniaev, *Shest' let s Gorbachevym* (Moscow: Kultura, 1993), p. 10; Eduard Shevardnadze, *Moi vybor* (Moscow: Novosti, 1991), p. 79;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65; Archie Brown, *The Gorbachev Facto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1.

² Vadim Medvedev, *V kommande Gorbacheva: Vzgliad iznutri* (Moscow: Bylina, 1994), pp. 29-31; M. S. Gorbachev, *Izbrannye rechi i stat'i*, vol. 2 (Moscow: Politizdat, 1987), pp. 95, 130-31.

³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80.

⁴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03.

⁵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294, 298.

⁶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302-4.

⁷ Cherniaev, *Shest' let*, p.94.

⁸ 见 *Izvestiia*, June 22, 1986, p.1; V. I. Vorontikov, *A bylo eto tak...Iz dnevnika chlena Politbiuro TsK KPSS* (Moscow: Soviet veteranov, 1995), pp. 102-3.



的一种转变。正如他在1月份全体会议中所说，“社会主义民主并不是过度容忍、不负责任或者无政府主义”¹。它是同纪律与责任联系在一起。

最初，开放政策几乎全部体现在政府机构的管理与国家的统治渠道中，即新闻界、电影剧场和国家机构。尽管党的坚定分子试图限制制度化背景下公开言论的界限，但他们这种努力却多次失败了——有时候则是由于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干预。但到了1987年春，嬉皮士、生态主义者、犹太人拒移民者、俄罗斯民族主义者和波罗的海政见不同者的一些小群体开始走上街头，进行小规模游行示威，以检验被许可的范围。在大多数情况下，警察只是在观察而并没有采取任何干预措施。²当局对抗议的这一不同的反应使人们认识到街道已成为一种新的政治空间。

在当时，几乎所有的抗议都打着改革的旗帜；它们并不反对共产党。事实上，戈尔巴乔夫也将这些行动视为苏联体制改革的一股积极力量。他在1987年6月的政治局会议上说，尽管游行示威有时是扰乱现象，我们的党“应当行动起来以便阻止它们的发生”，并不是在它发生之后去逮捕其参与者，而是“要事先去去除会带来这一后果的那些问题。我们拥有大量人员以及一个由被雇佣者组成的军队，而他们的工作就是要解决这些将走上街头的人们所面对的问题。不过，他们现在并没有这么做。”³在1987年5月6日俄罗斯民族主义团体“记忆”（*Pamiat'*）所发起的一场臭名昭著的游行示威中，莫斯科地区的党魁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同意会见示威者，并认为他们将爱国主义精神融入艺术的要求是正当的，承诺去考察这一组织得到官方认可的可能性。⁴

1987年夏，实现了两大进步，而这也曾将孤立的抗议行动不断结构化。第一个进步是克里米亚鞑靼人所发起的一致争取返回故土权利的抗议运动。他们是在1944年被斯大林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的。这一阶段也是苏联抗议行动的第一个长时间高潮阶段。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这项事业持续了整个斯大林统治后期，特别是在1960年代末期，他们在乌兹别克斯坦、克里米亚和莫斯科均发动了游行示威运动，但可惜最终失败。到1986年，苏维埃政权有条不紊地打压任何有关克里米亚鞑靼人境况的公众讨论，甚至还将提出这一问题的政见不同者关进了精神病监狱医院。到1980年代，克里米亚鞑靼人民族主义运动走向衰落。这一方面是由于其运动领导人被捕，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运动在争取返回克里米亚斗争中所采用的“所有策略性措施都没有效果”⁵。尽管对于克里米亚和种族灭绝的记忆在克里米亚鞑靼人家庭中代代相传，而且克里米亚鞑靼人也依然是一个不同于中亚其它族群的文化共同体，但大批人在1980年代初期便已选择在乌兹别克斯坦扎根落户，而且受事态发展必然性的影响，他们已经失去了返回故土的希望。⁶

但在1987年初，一大批克里米亚鞑靼人领导者从监狱中被释放，以及斯大林时期所严厉镇压的媒体讨论被开放，这些都给予了克里米亚鞑靼人积极分子们对于行动可能性的新希望。4月份，他们在塔什干起草了一份致戈尔巴乔夫的请愿书，并决定派一个“人民代表团”去莫斯科会见苏联领导人。6月底，来自克拉斯诺达尔和乌兹别克斯坦“人民代表团”的成员陆续抵达莫斯科。这些代表们并未见到戈尔巴乔夫，而是受到了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副主席彼得·杰米契夫（Petr Demichev）的接见。杰米契夫并未表示出任何支持，但承诺会将他们的恳求带给戈尔巴乔

¹ *Pravda*, January 28, 1987, p.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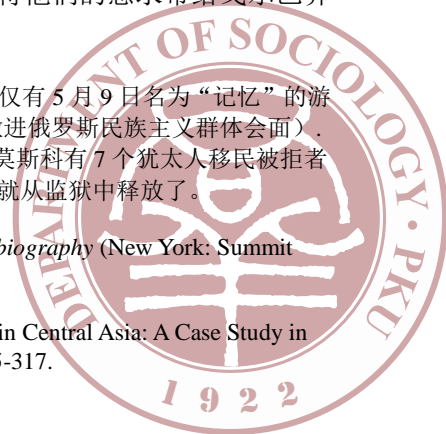
² 在1987年2月至5月期间所发生的12例参与人数超过100人的游行示威中，仅有5月9日名为“记忆”的游行示威这一例受到了警察的干预（这是因为鲍里斯·叶利钦早前曾经与这一激进俄罗斯民族主义群体会面）。*Vesti iz SSSR*, 10-14, 1987. 小规模示威游行往往被受到镇压，例如，2月9日在莫斯科有7个犹太人移民拒者所发起的支持释放约瑟夫·贝京（Iosif Begun）的行动。不过，贝京不久之后就就从监狱中释放了。

³ *Cherniaev, Shest' let*, p.149-50.

⁴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87, p. E6; Boris Yeltsin, *Against the Grain: An Autobiography* (New York: Summit Books, 1990), pp. 120-21.

⁵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p. 152.

⁶ 关于克里米亚鞑靼人的流放，见 Brian Glyn Williams, “The Crimean Tatar Exile in Central Asia: A Case Study in Group Destruction and Survival,” *Central Asia Survey*, vol. 17, no. 2 (1998), pp. 285-317.



夫。一直等到7月6日仍未收到戈尔巴乔夫的回复，“人民代表团”120名成员高举着“民主与开放——克里米亚鞑靼人同样需要！”的横幅，在红场举行了一场短暂却喧闹的游行示威。这一次，杰米契夫以戈尔巴乔夫的名义接见了他们，并保证会在7月底前解决这一问题。代表们决定直到问题解决再离开莫斯科。同时，还成立了一个由最高苏维埃主席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领导的特别政治局委员会，来处理他们的这一要求。

7月22日，召开了一次克里米亚鞑靼人代表与中央书记处工作人员的会议，但这次会议使代表们认识到，书记处鲜有人支持他们的要求。7月23日，数百名克里米亚鞑靼人示威者再一次聚集在红场。他们就坐在圣巴索教堂下的警察警戒线后，反复喊道“我们要见戈尔巴乔夫！”，并且表示直到取得了返回故土的权利后方才离开。这些非俄罗斯人在苏联极具象征性的中心地点所进行的未受抑制的持不同政见的行动，也吸引了新闻界与当地居民的关注。抗议行动在乌兹别克斯坦和克拉斯诺达尔同步发生。莫斯科的静坐者们直到7月30日才受到警方的干扰。那时，他们被聚拢起来驱逐出莫斯科。¹但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的运动并没有就此停止。一回到家，民族主义积极分子便结合克里米亚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Crimean ASSR）成立66周年之际，于9月和10月在乌兹别克斯坦、克拉斯诺达尔和克里米亚组织了一系列游行示威，取得了一次新的抗议行动高潮。而抗议行动的第三次高潮则发生在1988年初。²正如一位克里米亚鞑靼人积极分子后来评论的那样，1987年7月的游行示威是“克里米亚鞑靼人破釜沉舟之举”，“在为了争取权利而进行斗争的过程中，克里米亚鞑靼人之间的团结达到了顶点”，而且“即使那些自认为远离民族事业的人也走上了斗争的道路”。³更重要的是，从苏联随后的事件这一视角来看，这些行动表明街头政治（street politics）对于敦促民族主义问题解决的新的可能性，并且构成了后来开放动员周期中的第一次持久性抗议运动。

第二次发展体现出，在新的街头政治中，具体的民族主义挑战与更为激进的现实之间具有日益增强的相关关系。1987年2月，戈尔巴乔夫访问了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并留下了这样一种印象，即“尽管人们在我们广阔的国家中生活自在”，但仍缺乏对改革的巨大热情。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对“领导们官僚主义作风”的反抗。⁴但是，当戈尔巴乔夫在波罗的海地区呼吁民主化时，莫斯科新闻界所讨论的斯大林主义的公正以及在莫斯科体现出的对抗议群体的相对宽容，使波罗的海政见不同的分离主义者感受到一个新机会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刚刚从监狱中释放出来。1986年7月，一小撮被称作赫尔辛基-86、旨在争取拉脱维亚独立的政见不同者突然聚集在利耶帕亚。它的领导者立刻被逮捕了。这一行动本来预定在1987年1月发动，但令对手意外的是，行动突然爆发。这有可能是因为当时政治罪犯普遍被释放。⁵1987年5月，这一组织又号召6月14日在里加的自由纪念碑前举行敬献鲜花的仪式。6月14日正是斯大林1941年将数千名拉脱维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的纪念日。当局采用了多种策略以阻止游行示威的发生，甚至声称将在同样时间、在纪念碑前举行另一场活动——“运动会”。然而，还是有多达5,000人参与了游行示威，不过，媒体对示威者与警察之间对抗的报道极少。⁶

6月14日里加成功的游行示威运动（尽管是以诽谤的口吻，但也算是被苏联新闻界广泛报

¹ 见 M. N. Guboglo, S. M. Chervonnaia, *Krymskotatarskoe natsional'noe dvizhenie*, vol. 1 (Moscow: Institut etnologii i antropologii, 1992), pp. 133-139; *Vesti iz SSSR*, 13-22, 1987; 14-4, 1987. 关于莫斯科人对这些事件的公众反应，见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6, 1987, p. 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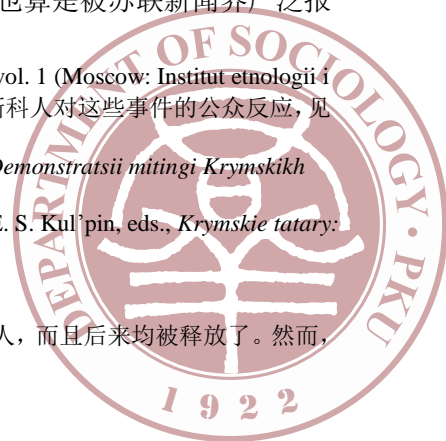
² 见 Mustafa Dzhemilev, ed. *Shest' desiat shestaia godovsbchchina Krymskoi ASSR. Demonstratsii mitingi Krymskikh Tatar* (London: Society for Central Asian Studies, 1989).

³ Sh. U. Mustafaev, "Evolutsiia samosoznaniia-vzgliad iznutri," in A. P. Viatkin and E. S. Kul'pin, eds., *Krymskie tatory: Problemy repatriatsii* (Moscow: Institut vostokovedeniia RAN, 1997), p. 32.

⁴ Cherniaev, *Shest' let*, p. 143.

⁵ *Vesti iz SSSR*, 1/2-1, 1987; 3-12, 1987.

⁶ *Vesti iz SSSR*, 11/12-3, 1987; *Glasnost'*, no. 5 (July 1987), p. 30. 参与者中被捕11人，而且后来均被释放了。然而，赫尔辛基-86的领导者后来却因逃兵役而受审。



道) 激发了一场更加宏大的挑战——一系列游行示威于 8 月 23 日, 即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 (Molotov-Ribbentrop Pact) 签订 48 周年这一天, 在波罗的海三国首都同时发生。波罗的海政见不同者与流亡团体之间的联系使之在这一事件中进行合作。而美国之音、自由电台等外国广播 (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新思维”而不再受阻) 在波罗的海听众中有效地传播了抗议行动。¹ 在塔林, 近 2,000 名示威者参与了抗议行动, 而维尔纽斯有 500 人。据报道, 这些抗议行动鲜有警察干预。而这一运动标志着新的街头政治蔓延至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在里加, 多达 8,000 人参加了抗议, 但有数百人被捕, 而且, 警察使用消防水带对准人群, 使一些人受伤。尽管如此, 拉脱维亚共产党领导人随即指责地方当局未能采取有效措施阻止集会的发生。² 在随后的几个月内, 波罗的海分离主义者陆陆续续组织了一些公共抗议行动 (特别是在波罗的海独立的象征性日期前后), 而当局也不断逮捕他们并采取其他一些高压统治措施。这些分离主义者并未能够在波罗的海任一共和国举行实现最终独立的运动。成立于 1988 年夏的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组织起到了这一作用。而且, 正如我们将看的那样, 运动与当局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然而, 1987-1988 年间波罗的海分离主义运动意义重大, 不仅使街头政治愈发显现出一种新的可能性, 而且将波罗的海独立运动相互联系起来。通过这些, 他们形成了一种跨民族影响, 而这是民族主义浪潮形成的核心。

在 1987 年 9 月, 政治局内部右派与左派之间关于政治改革方向的争执逐渐凸现, 而苏联领导集体的分歧也第一次暴露在公众面前。³ 1987 年 10 月, 叶利钦被逐出政治局。尽管这主要是由于他自身犹疑的个性, 但这一事件也属于争执和分歧的领域, 标志着苏联领导集体公开不合的开端。到 1988 年 1 月, 上述分歧不断加深, 直至在政治局周例会上关于自由化恰当范围的讨论“急剧升温”。⁴ 但从重要意义上来说, 民族主义依旧没有爆发。直到 1988 年 2 月, 开放时期内苏联主要抗议行动的第一次高潮方才出现。它呈现出具体的民族形式——1988 年 2 月亚美尼亚人针对卡拉巴赫问题所发起的动员。众多的抗议行动以及它们与其他群体的争端行动之间的关系, 已经足以证明民族主义浪潮开始出现。

当 1921 年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边界问题出现重大争端时, 两国较大的少数民族——亚美尼亚人和阿萨拜疆人——都居住在与己不符的对方国度之中。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拥有他们自己的联邦亚单位——一个自治省——作为表明自身文化权利的途径。阿塞拜疆人在随后数年间大量迁移到卡拉巴赫, 致使亚美尼亚人在总人口中的比重由 1920 年代的 95% 降低到 1979 年 76%。而且, 亚美尼亚人时常抱怨他们在经济投资和使用亚美尼亚语的大众传媒中受到歧视。从 1920 年开始, 卡拉巴赫问题经常以请愿、投书运动、地方党政官员的上诉以及偶尔的游行示威等多种形式被提出来。但是, 他们的努力不仅被莫斯科方面所忽视, 而且其领导者也常常受到地方阿塞拜疆当局的迫害。⁵ 事实上, 苏联新闻界将这一问题描述为似乎“已经被一劳永逸地解决了”⁶。但是, 随着开放政策的实施, 关于卡拉巴赫问题的争端的前景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1987 年 7 月, 长期担任亚美尼亚共产党第一书记的卡伦·杰米尔强 (Karen Demirchian), 在共和国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中被严厉指责为对待破坏过于宽容和偏袒。这被认为是莫斯科方面试图削弱杰米尔强的势力并打算用一名改革主义领导者来取代他的信号。不久, 中央报纸上出现了

¹ *The New York Times*, August 25, 1987, p. A3.

² *Sovetskaia, Latviiia*, August 30, 1987, p.1; *Vesti iz SSSR*, 15/16-3, 1987.

³ 见 Yegor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93), pp. 85-86, 105-6. 也可见 Chebrikov's speech in *Krasnaia zvezda*, September 11, 1987, pp. 1,3.

⁴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378.

⁵ Levon Chorbajian, Patrick Donabedian, and Claude Mutafian, *The Caucasian Knot: The History of Geo-Politics of Nagorno-Karabakh* (London: Zed Books, 1994), pp. 144-47.

⁶ Ronald Grigor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Armenia in Modern History* (Bloomington, I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pp. 188-99.



攻击杰米尔强的言论。通过埃里温化工厂排放有害污染物这一事件，上述言论还将地方共产党领导集体描述为一个不关心人民健康的秘密犯罪集团，同时也被广泛视为“中央政府企图发动一场反对地方政府的人民起义的一种策略”，以此作为撤职的借口。¹直到这时，生态游行示威已经在塔尔图、列宁格勒、喀山、伊尔库茨克等地爆发。这也是一股在不同时期都与民族主义要求相互关系的生态保护动员潮流的开端。²9月1日，数百名亚美尼亚人在一家导致污染的合成橡胶厂前举行游行示威，而当局并没有采取任何镇压行动。在10月初的卡拉巴赫，卡拉巴赫 Chardokhlu 镇一个亚美尼亚人国营农庄 (sovkhos) 和一个阿萨拜疆人集体农庄 (kolkhoz) 之间关于边界的争端导致了地方动乱。当局动用了两个营的兵力，而且一名克格勃人员在维持秩序中受伤。这些事件成为亚美尼亚民族主义积极分子促使卡拉巴赫问题政治化的机会。在10月中旬，另一场未经批准的生态游行示威在埃里温爆发，吸引了多达5000名参与者。同样，这一次当局也几乎没有反应。³紧接着第二天，1,000人又在埃里温举行了游行示威。他们高举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要求阿塞拜疆将卡拉巴赫还给亚美尼亚，并声援亚美尼亚的 Chardokhlu 边界之争。从生态学到民族主义，要求的扩大化为苏联众多案例树立了一个模板，使之不断重复。因为民族主义挑战者往往使用更易于接受的环境保护问题来试探被准许的界限。在上述事件中，当示威者拒绝听从解散的要求时，游行示威便会被警察的残酷镇压。⁴然而，到了这时，民族主义社会运动组织的萌芽已经出现。

尽管面对持续的抨击，杰米尔强仍然坚守在他的岗位上。但是，到了1988年2月，受多重因素的鼓励，包括不断扩大的公共讨论范围、1987年10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对斯大林主义的抨击、多名戈尔巴乔夫顾问（其中一些是亚美尼亚人）在卡拉巴赫问题上的支持性言论、阿塞拜疆党前任主席盖达尔·阿利耶夫 (Heydar Aliiev) 从政治局退休，以及莫斯科方面打算调查这一问题的传言，⁵卡拉巴赫阿塞拜疆人加紧了他们的要求。正如戈尔巴乔夫顾问之一，同时也是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达涅里亚·沙赫纳扎罗夫 (Georgii Shakhnazarov) 后来谈及这些运动的组织者时所说，“与故土团结的可能性，使他们认为这种不太可能的自由能够实现。”⁶

1987年8月，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向莫斯科中央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主张将卡拉巴赫还给亚美尼亚的请愿书。共计有25000人在上面签字。然而，直到1988年2月一个来自卡拉巴赫的官方代表团抵达莫斯科来敦促这一问题时，这份请愿书方才被重视。代表团得到许诺说，他们的请求将会被认真考虑。但到2月初时，他们却被粗暴地告知了中央委员会相关机构所给予的一个否定答复。⁷这导致了整个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联合发起了一场非暴力反抗运动，要求地方立法机构召开会议，将该地区划归亚美尼亚的领土范畴。而地方党组织本身也参与了这次运动的组织。⁸同时，埃里温还爆发了一系列反对在城市郊区建立新的化工厂的生态游行示威运动。当得知斯塔捷潘纳克特地方立法机构提出了统一亚美尼亚的议案但又一次遭到莫斯科方面的否决时，生态游行示威迅速表现出对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支持，并吸引了多达3000名参与者。

¹ Pierre Verluise, *Armenia in Crisis: The 1988 Earthquake* (Detroit, MI: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84.

² 见 Jane I. Dawson, *Eco-nationalism: Anti-Nuclear Activism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Russia, Lithuania, and Ukrai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6).

³ *Vesti iz SSSR*, 19/20-5, 1987; *Glasnost'*, no.10, 1987, p. 8. 组织者只是被叫到克格勃“谈话”而已。

⁴ *Vesti iz SSSR*, 19/20-5, 1987.

⁵ 见 Vorotnikov, *A bylo rto tak*, pp.193-94; Suny, *Looking toward Ararat*, p. 197.

⁶ Georgii Shakhnazarov, *Tsena svobody. Reformatsiia Gorbacheva glazami ego pomoshchjika* (Moscow: Rossika, 1993), p.206.

⁷ 见 Nikolai Ryzhkov, *Perestroika: istoriia predatel'stv* (Moscow: Novosti, 1992), p.203; *Vesti iz SSSR*, 4-1, 1988. 在过去3年内，中央委员会收到了500封抱怨卡拉巴赫地区的信件。See *Soiuz mozhno bylo sokbranti'* (Moscow: April'-85, 1995), p.22.

⁸ 尽管卡拉巴赫地方党政机关的领导集体普遍反对这一运动，但它的主要组织者之一却是“坚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Nagorno-Karabakh obkom) 的总指挥。不过，地方党政机关并不试图阻止游行示威，而且巴库的这一尝试最终也失败了。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02; Vorotnikov, *A bylo eto tak*, pp. 194-195.



2月21日晚，反亚美尼亚大屠杀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 *Gadрут* 镇发生，16人受伤，2人死亡。听闻这一暴力事件，埃里温爆发了多个游行示威，涉及人数多达一百万。他们要求不仅要将领土还给亚美尼亚，而且还要保护生活在卡拉巴赫地区的亚美尼亚人的人身安全。示威者们高举着戈尔巴乔夫的肖像以及标语“我们信任你”。¹甚至连杰米尔强也开始支持卡拉巴赫问题，并向政治局施压。一些分析家猜测杰米尔强因受到莫斯科方面的辞职压力，而选择以支持示威者获取地方支持以维持其职位。²2月24日，关于卡拉巴赫与亚美尼亚再统一问题的组织委员会成立。第二天，戈尔巴乔夫会见了该委员会的两名代表，同意委员会所提出的一套解决方案，即加强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的文化与经济自治权以换取其放弃领土问题并停止游行示威。³2月27日，埃里温民族主义游行示威的参与状况迅速减少，直至2月28日彻底停止。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当埃里温亚美尼亚动员减弱的时候，亚美尼亚阿塞拜疆难民所组织的集会却出现在阿塞拜疆苏姆盖伊特中心广场。而这带来了反亚美尼亚暴力运动的一次大爆发，并将冲突推向了一个新阶段。后来，1988年也被亚美尼亚人视为“凡事皆有可能的一年”。⁴

以上是我对动员的早期发展所进行的详细描述。这是因为这种细致的关注能更好地展现出动员潮流是如何不断前进的。首先，苏维埃政权在避免具体动员挑战上的失败促使其他群体发起了新的挑战。犹太人被拒移民者、俄罗斯嬉皮士和民族主义者未经许可的动员促使克里米亚鞑靼人决定组织一场抗议运动，但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波罗的海分离主义者尝试组织游行示威，继而影响到亚美尼亚积极分子的行动。所有事件都是沿着这一发展逻辑，可以此类推。国家领导集体内部的冲突以及成功的抗议行动唤起了公众更多的期待。这是一种要求的扩大化，即从相对温和的关注到更直接地挑战民族秩序的问题。正如亚美尼亚事件也体现的那样，通过所产生的牺牲感以及族群边界的变动，暴力成为动员大众最有效的力量之一。

这些早期的民族主义动员案例中的制度偶然表现突出。尽管组织行动的积极分子非常有名，许多早期抗议行动还是可以通过镇压轻易地制止。或者像亚美尼亚事件中，如果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卡拉巴赫亚美尼亚人关于把领土转让给亚美尼亚的请愿书，这很有可能会改变上述问题的全部政治局势（平复了亚美尼亚人，但同时在阿塞拜疆激起暴行，紧接着带来其他群体改变苏联内部边界的尝试）。因为挑战者从其他成功挑战的例子中得到了勇气，所以，国家领导者试图从相反的逻辑来保持民族秩序，避免一个领域内的挑战影响到其他领域。这种举措一点也不奇怪。从回顾中，我们可知，苏联领导集体非常重视民族主义彼此之间的跨民族影响。而从“多米诺骨牌理论”出发来看卡拉巴赫所发生的全部事件，我们会担心边界的改变有可能对其他群体起到激励作用。正如戈尔巴乔夫在1988年7月4日一次政治局会议中所说，“重新考虑边界是不切实际的；这将会走向灾难，而且不仅仅是在这些地区。”⁵正是基于这一假设，苏联领导集体才拒绝同意把卡拉巴赫让给亚美尼亚的请求，否则将有可能导致各种要求的集体爆发。我们无法确定戈尔巴乔夫的这个判断是否正确，但随之而来的失败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非暴力政治中内部边界的改变具有一定的空间，是否有可能改变事件的进程。尽管戈尔巴乔夫试图阻止内部边界冲突的横向扩张，但加盟共和国之间的边界冲突最终还是扩展至每一个事件（尽管我们将在第6章看到，主要由于缺少非暴力选项，它们多是以一种暴力的方式进行）。问题中与群体间的联结，群体视其他案例为比较来源的方式，以及当局维持秩序的模式，都营造出一种相互联系感，而这在民族主义浪潮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¹ *Vesti iz SSSR*, no. 4-1, 1988; VerJuse, *Armenia in Crisis*, p.86.

²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02; *Ekspress kbronika*, no. 52, Dec. 17-24, 1991, p.6.

³ 见 Shakhnazarov, Tsena sovbody, pp. 205-10.

⁴ Chorbajian, Donadian, and Mutafian, *The Caucasian Knot*, p.149.

⁵ *Soiuz možno bylo*, p.30.



在周期中界定浪潮

界定边界是认识任何现象的第一步。但是，界定动员周期和民族主义浪潮的边界却并不简单。这一方面是因为它们是行动的动态过程，而非单一事件，其开端和终结也都是模糊的。我把探究开放时期民族主义浪潮的终结的任务放在后面进行讨论。现在，我的任务是去探讨动员周期开始的时间以及民族主义浪潮与其作为其中一部分的更大范围上的动员周期之间的关系。

要想理解周期和浪潮的源头，需要对争端在政治常态中的表现进行初步认识。在争端“安静”时期，国家机构利用它们的战略性地位来采纳秩序的主导观点，排斥其他思想。这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尤为明显。由于将稳定视为首要目标，并努力规范社会现状，在开放时期的一些说法中，勃列日涅夫时代最终是作为“停滞的时代”而著称。“三思而后行”，这是苏联领导人关于政策制定的合适模式想要传递的妥当形象。赫鲁晓夫去斯大林化的不稳定运动被停止，政治精英在执政中普遍奉行广泛的稳定性原则。而苏联领导集体向国内外展现出一种团结一致的形象。此外，赫鲁晓夫不稳定的自由化过程中所出现的新的分离主义运动也被坚决镇压。政见不同者被刻画成精神错乱。因为苏维埃政权努力灌输给人们一种思想，即只有忠于现存秩序才是正常的，而精神病监狱医院恰恰就是这种努力的象征。

然而，尽管受到政权的镇压，政见不同者还是继续活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历史众所周知。一些人——最多有数千人——通过持不同政见者的公众行动招致了苏维埃政府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属于一种扩散了的反抗，主要涉及到个体或小群体的行动，而非大规模的集体行动。鉴于在苏联这样压抑性的环境中组织大规模集体行动存在巨大困难，政见不同者青睐使用公开信、请愿书或者绝食等策略。其余那些内心反对苏联政治但并不愿受到政府报复的人，则选择在苏维埃机构中安静地工作，或是进行一些反抗体制正式规范的日常实践。图 2.1 显示了国家主导时期挑战者挑战政府方式的不断发展。它反映了 1965-1987 年间可获取信息的 264 个大规模抗议游行示威运动和 50 件大规模暴力事件的时间分布，¹以及同一时期苏维埃档案所公布的 2,424 个犯“反苏维埃宣传鼓动罪”的信息²。尽管样本中绝大多数游行示威（77%）和大规模暴力事件（64%）都与民族主义有关，但我在图中并没有发现这些动员的具体潮流之间存在区别。早在开放政策之前，苏联的动员主要受民族主义问题的影响。而这表明了民族主义浪潮产生中起作用的深层结构性因素。正如这些图所反映的那样，大规模争端并没有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消失。表 2.1b 显示，1965 年参与游行示威的人数远远超过 1987 年，而 1987 年正是开放政策已开始实施的年份。然而，在 1965 年所记载的 13 次抗议游行示威中，绝大多数参与者是在 1965 年 4 月埃里温纪念亚美尼亚大屠杀遇难者的游行示威中，有 100,000 人走上了街头。³相反，在 1987 年所记录的 69 次抗议游行示威中，规模最大的（列宁格勒省基里希生态游行示威）也只涉及了 10,000 人。⁴但是，1965 年亚美尼亚抗议行动这一高潮并不属于动员周期的一部分。因为这一动员并没有扩散至社会的各个领域，而且也没有发生挑战政府的坚实而持久的尝试。在前开放时期，大规模争端的形式各不相同。正如表 2.1c 所显示的那样，这一时期鲜有著名的大规模暴力事件发生；它们通常并不采取游行示威的方式。

我们还可以得到 1965-1987 年间集体行动的时间分布。表 2.1a 和 2.1b 显示，在 1965-1968 年间的游行示威规模更大、频率更高。当时，政见不同者因赫鲁晓夫被撤职而释放，勃列日涅夫

¹ 尽管关注上述行动方式，但我并不是说争端行动只体现为它们。反而，重点是国家机构给予挑战者的机会影响了争端的形式。这一分析仅纳入规模超过 100 人的游行示威。

² 政见不同的内涵应当比这些“罪行”的范围要大。刑法的无数条例被用来监禁这些持不同政见者。一些政见不同者被宣布有精神病而被关进精神病病房，还有一些人移民或被强制流放。

³ 见 Alexeyeva, *Soviet Dissent*, p.123.

⁴ 见 *Chelovek i zakon*, no.7, 1989, p.33.



放弃了赫鲁晓夫时期去斯大林化的努力，而许多民族主义者通过街头行动来争取权力的尝试导致了一系列事件的发生。面对一套反政见不同者的系统性镇压行动，上述事件便呈现出衰退趋势。同样，1970年代末和1980年初也爆发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这不仅是对波兰事件的回应，同时也像表 2.1b 反映的那样，这一时期反政见不同者的镇压行动明显减少。但是，上述事件都没有发展为一个动员周期。参与其中是极其受限的。主要由于镇压所致，争端行动相互独立，并很少再次发生。而且，从整体上来说，这些行动在政治进程中处于边缘地位。由于政府不断镇压那些通过抗议挑战其政治的企图，而且也很少有成功挑战的先例，争端并未通过类推在时间和空间上蔓延。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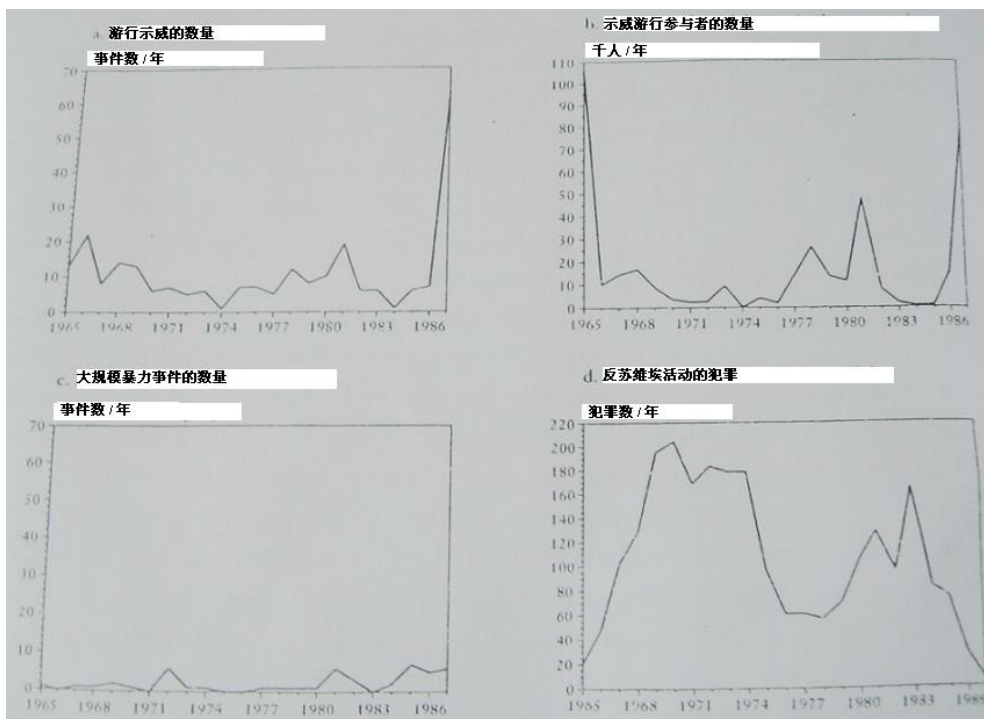


表 2.1. 示威行动、大规模暴力事件和政见不同者反苏维埃活动的犯罪，1965-1987。
(反苏维埃活动犯罪是指为了“反苏维埃宣传鼓动”或“蓄意传播危害苏维埃政府和社会秩序的谣言”而犯罪。Source: *Istochnik*, no.6, 1995, p. 163.)

相反，到了 1987 年，抗议行动的小高潮出现，并开始持续下去且相互影响。原因很明显：由于开放政策的实施，制度约束开始松动，并改变了看似可能的边界。因而，它促使政见不同者不断尝试通过动员行动来试探政治这潭水究竟有多深，同时也鼓励他们在挑战群体之间建立一种新的辩证关系。表 2.1a 显示，与之前 20 年相比，1987 年游行示威的数量显著增加，并且完全不同于以前的争端模式。更为重要的是，这些争端行动的主体来自不同地方，所提出的请求也各不相同。不过，他们从未受到过其他群体行为的影响，因为他们自认为共同遭受了来自于苏维埃政权的镇压。除了生态、人权、反战主义者和印度教克利须那派的游行示威外，犹太人、克里米亚鞑靼人、拉脱维亚人、爱沙尼亚人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等群体也举行了持续的抗议活动。而这带来了 1987 年底发生在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针对民族主义问题去动员人

¹ Alexeeva 和 Chalidze 在对 1956-83 年间所有类型和规模的 2000 例抗议事件的一份未发表的研究中，指出勃列日涅夫时期各种规模的抗议行动均有增加，但是，除波罗的海地区和格鲁吉亚以外，这些行动的参与人数有明显减少。因此，在 1980 年代初，抗议行动大幅增加，超过先前 30 年。而这是因为小型抗议行动增加，而并非大规模行动。Ludmilla Alexeeva and Valery Chalidze, “Mass Unrest in the USSR,” Report No. 19 submitted to the Office of Net Assessment of the U.S. Department of Defense (OSD/NA 85-2965), August 1983, pp. 378-79.

民的种种尝试。简而言之，在 1987 年，各个群体之间争端行动的相互影响已经变得非常明显，特别在民族主义抗议行动中。

一些人认为 1986 年 12 月应当被视为开放政策动员周期的开端，具体来说，是指 12 月 17 日和 18 日的阿拉木图游行示威和动乱。当时，多达 10,000 人走上了街头，反对开除哈萨克斯坦共产党领导人 Dinmukhamed Kunaev 并任命一名俄罗斯人来替代他的决议。¹但是，阿拉木图事件在很多方面上仍是前开放时期抗议行动的继承，而不属于争端行动的后续模式。这很好地体现了发生在一个周期之中的事件与周期以外的其他事件之间的差异。首先，阿拉木图动乱对前苏联其他地区的动员几乎没有任何影响或联系。这些事件缺少运动组织（它们是突然被哈萨克国立大学的一群学生组织起来的），而且，直到 2 年半之后，才带来了一场持久性运动。²此外，阿拉木图事件中的大规模镇压（多达 2400 人被逮捕，459 人受伤，2 人死亡）有效地抑制了随后数年间在哈萨克斯坦的深入动员。直到 1989 年 6 月，哈萨克人才再次参与到重大的抗议动员之中——当时，数千人走上了省石油重镇 Novyi Uzen' 的街头，对当地麦斯赫特亚土耳其人进行暴力屠杀。³ 1986 年 12 月的阿拉木图事件仅仅持续了 2 天，也并没有激起挑战政府的其他后续行动。事实上，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些抗议行动的学生组织者是受到苏维埃体制自由化改革的激励而走上了街头。相反，这是由于抗议莫斯科方面一个卑劣的人事决策而发起的暴行。他们不过是在回应，而不是主动要求。

动员周期的开端更适宜被设定在 1987 年夏的某个时候。那时，挑战政府的各种尝试——特别是那些新民族主义运动——变得越来越规范化，并开始相互影响。我们之所以以此作为周期的开端，基本上是由于之后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包括新群体在内的扩大了挑战以及事件本身起到越来越重要的因果作用。在当时，挑战尚未常态化，还能够不费力地被制止。动员周期（以及民族主义浪潮）的形成主要依赖于制度偶然事件。尽管，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某一群体而非其他群体能够利用这些偶然事件却并非是偶然的。

同界定周期的边界一样，界定浪潮与周期之间的界限也非常复杂。这是由于前者嵌套于后者之中。动员周期由一系列行动的波流构成，而这些依赖于媒介与之前动员行动的联结。这种联结超越了时空的阻隔，而它的产生与积极用途将赋予周期中的行动具有一种前进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行动之间联结的产生过程是其在动员周期中权力自我再生产的关键。这发生在多个过程之中。某一时间或地点上的偶然事件通常是促进联结产生的一个有力因素。通过制造从众效应、降低对后续行动的制度约束以及提升成功的可能性，先前行动的增加——它在时间上的密度——使后续行动更有可能发生。⁴通过网络联结和外溢现象，地理上的可及性也增加了行动扩展的可能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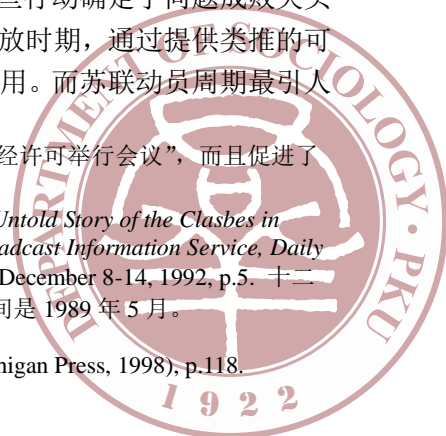
但是，行动之间的联结往往以类推为基础，也就是说，在问题的本质、情形或动员目标上具有相似性。因此，动员不只是从单一空间背景下的不同时间上或在连续的空间上获得前进的权力，往往也包括那些彼此看似毫不相同、相距甚远的共同体。所谓的相似性并不是给定的。它们一方面依赖于现有的交流渠道，同时也通过行动架构而被形塑。而这些行动确定了问题成败关头的本质，谁应当为此而受到指责，并提出了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开放时期，通过提供类推的可能性，更加开放的媒体传播在动员的空间扩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苏联动员周期最引人

¹ 例如，哈萨克作家 Olzhas Suleimenov 声称“阿拉木图的学生和工人第一个未经许可举行会议”，而且促进了前苏联后来一系列起义的发生。Kazakhstanskaia pravda, June 10, 1989.

² 对于这些事件的详细介绍，见 Helsinki Watch, *Conflict in the Soviet Union: The Untold Story of the Classes in Kazakhstan* (New York: Helsinki Watch, 1990); *Literaturnaia gazeta, in Foreign Broadcast Information Service, Daily Report: Soviet Union (FBIS)*, January 5, 1990, pp.66-69; Ekspress Kbronika, no.50, December 8-14, 1992, p.5. 十二月（Zboltoksan）运动由那些因参与 1988 年 11 月事件而受审判的人组织。时间是 1989 年 5 月。

³ *Izvestiia*, in *FBIS*, June 21, 1989, p.52.

⁴ See Mark Irving Lichbach, *The Rebel's Dilemma* (Ann Arbor, MI: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8), p.118.



注目的一面就是具体需求类型模式化扩展的程度。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被相对压缩的时期内，相似的问题在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不断发生。跨族群联邦体制或经济部长结构等具体的体制结构有助于争端模式化扩张的发展（1989年7月的煤矿罢工和1990年对于主权的严峻争端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案例）。而且，在具体的问题领域内，需求在周期中历经一个不断激进化的过程——从言论自由和公平竞选到多党竞争，从已改善的消费者供应和经济自治到政府因经济改革失败而退出。在这里，还显现出这样一种想法，即将动员周期视为围绕问题的实质性复合物而存在的一系列动员潮流。因为它允许我们能够更具体地调查运动和人们是如何在时间中去架构问题以及这些构架之间如何相互联系的变动方式。

图 2.2. 开放时期动员周期中动员的民族主义与自由化潮流，1987-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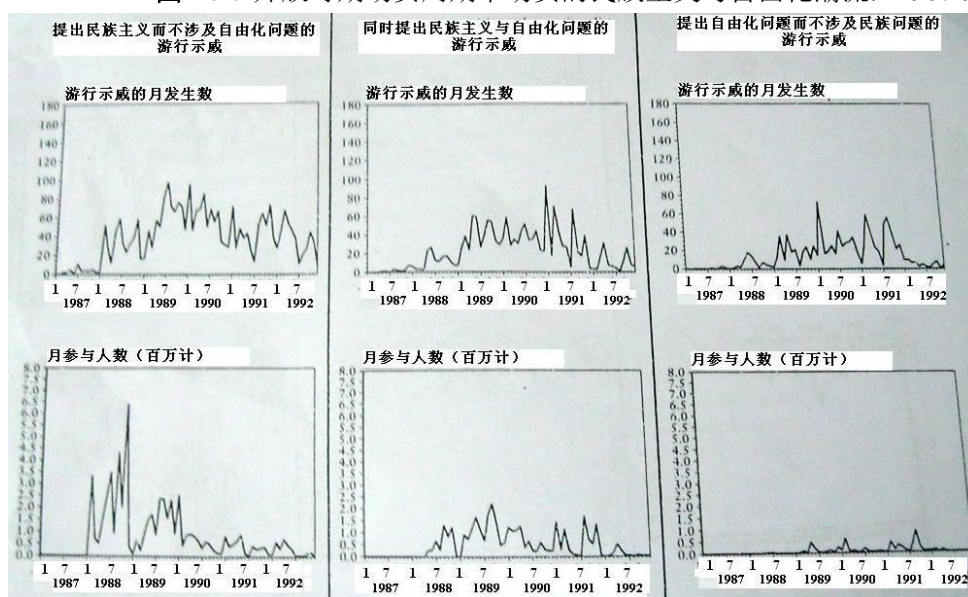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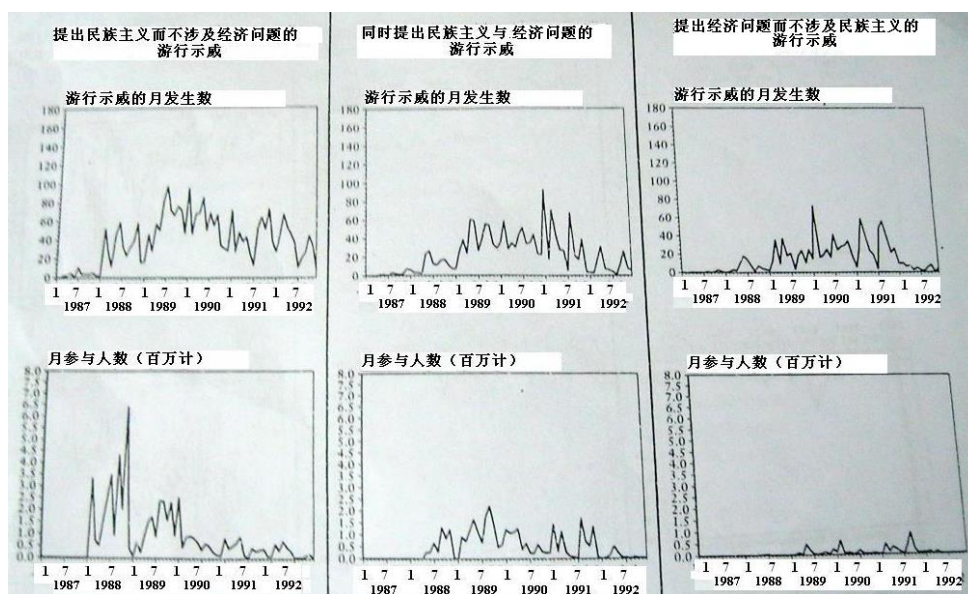


图 2.3. 开放时期动员周期中动员的民族主义与经济潮流，1987-92



在这一方面，民族主义是争取人民忠诚的许多动员载体的一种。在开放时期的动员周期内，重要的动员自治潮流——有时与民族主义无关，有时二者又相互关联——出现在民主化、环境正



义和劳工/经济问题中。图 2.2 通过区分那些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需求而并没有要求政体自由化、主张政体自由化而没有涉及跨族群民族主义需求的两类游行示威，发现了在周期及跨族群民族主义，而 42% 则只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要求而没有涉及自由化问题。更重要的是，如图 2.2 所示，对于那些捍卫体制自由化而没有提及跨族群民族主义的游行示威来说，绝大多数只是获得了相对较小的社会反响；特别是与同时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和自由化或仅仅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要求的游行示威相比。因此，在近 102,000,000 名示威者中，仅有 6% 参与到那些仅号召体制转型而没有表达跨族群民族主义要求的游行示威之中，而那些旨在宣传跨族群民族主义而不包括自由化要求的游行示威则涉及到 57% 的参与者；同时表达两种需求的占了 33%。我们看到民族主义不仅在周期内具有强大的动员力，而且它还作为体制转型的社会基础而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自由化所承受的最大的社会压力恰恰就来自于民族主义。

在图 2.3 中，尽管这一时期的生活标准明显降低，我们仍然可以在跨族群民族主义问题的动员响应与经济问题的比较中得到相似的发现。在这一时期，针对经济问题的动员尝试时断时续，而到苏联解体后的 1990 年下半年和 1992 年则开始变得日渐频繁。这一时期正是经济困难、经济崩溃和“休克疗法”日益加剧的阶段。但是，针对经济问题的游行示威却并没有得到大众的普遍响应，而是呈现为相对较低的动员人数。当与提出跨族群民族主义问题的游行示威相比，这一特征尤为明显。除了一些例外（白俄罗斯、东乌克兰、西西伯利亚和北哈萨克斯坦），民族主义把阶级视为这一时期苏联动员的基本架构——我将在第 8 章深入探讨这一问题。

上述问题在多重背景之中、在整个周期之间，都表现出不同寻常的力量和吸引力。由此，我们认为，开放时期的民族主义动员不仅仅是一股潮流，更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浪潮。很明显，相对于其他政治企业家，苏维埃国家所独有的大量结构性条件使民族主义企业家在动员周期内享有更大的优势，甚至也导致了其他企业家选择在民族主义架构下谈论问题。我们已经提到了一些因素：国家与政体之间的融合；多群体中少数民族不满情绪的历史遗产；苏联跨族群联邦政府结构；苏联的海外扩张。但是，这些推动条件并不是民族主义浪潮产生的唯一因素。机构改革和某一行动对后续行动的影响同样也自然地产生了强烈的影响。

争端的扩散和正常化

正如上述讨论所反映的那样，无法用某一时刻来界定周期和潮流。因为先前的争端会影响到后续的行动，它们往往作为相互关联的事件链而发生。制度约束的松动是争端在苏联最初出现过程中的核心要素，但随着争端逐渐发展并获得自身的动力，这些约束在事件产生中的作用会变得越来越小。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在 1987 年和 1998 年初，扩大的挑战不可避免地成为更大的动员周期的一部分。除亚美尼亚动乱之外，早期动员的规模相对较小。而且，尽管超越了先前 20 年，这些争端事件的发展速度依然相对较慢并易于控制。1960 年代和 1970 年代反示威者的镇压性行动，仍为 1987 年、1988 年绝大多数的挑战群体所熟知。尽管如表 2.1d 所示，在 1986 年，反苏维埃政治行动的定罪明显减少，而到 1987 年，这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了。只有在 1988 年末、1989 年间，争端行动才取得了潮流般的发展势头。那时，政治显然已经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更加开放的争议性领域，而且事件的速度也在时间上“加厚”了，大规模动员出现在多个地点，并开始相互依靠。在当时，一个明显的事实就是争端不能轻易地得到解决，而政治也进入到一个充满公开而相互关联的挑战时期。

制度偶然事件又一次在争端增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具体来说，制度偶然事件就是苏联领导集体关于改革的速度和目的日益紧张的冲突。由于反对群体在 1987 年末、1988 年初开始试探被允许的边界，苏联领导集体对于自由化界限的争执走向公开。以 1987 年 10 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



议承认有关斯大林遗产的任意讨论正当化为起点，苏联领导集体对开放作用的冲突在媒体中日益加剧。我们已经看到了领导集团内部斗争的早期阶段是如何促成了 1988 年上半年发生在亚美尼亚的大规模动员。相反，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事件看似证明了开放政策有可能带来不稳定，提出了党的保守派质疑开放政策是否会导致民族主义起义和族际冲突这一问题，并且还加剧了领导集体在自由化边界问题上的冲突。

1988 年 3 月 13 日，当戈尔巴乔夫正在对南斯拉夫进行国事访问时，《苏维埃俄罗斯报》（*Sovetskaia Rossiia*）刊登了列宁格勒化学教师尼娜·安德烈耶娃（Nina Andreeva）题为“我不能放弃原则”的文章。这篇文章严厉指责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运动引发了苏联社会的动荡不安，暗示那些伪装起来的“大同”趋势（犹太人的一个代称）和“左派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已经占据了共产党。¹许多知识分子将这篇文章视为开放政策即将逆转的标志。经过中央委员会大幅纂辑后的文章受到了中央委员会书记叶戈尔·利加乔夫（Yegor Ligachev）的公开赞扬。在 3 月底召开的一次政治局会议专门讨论了这篇文章的争辩，一些政治局成员公开支持文章的精神，而戈尔巴乔夫私下说苏联领导集体的“分裂是不可避免的”。²4 月 5 日《真理报》（*Pravda*）发表了戈尔巴乔夫及其顾问的相关回应，其中，他们将那篇文章称作“反改革的宣言”。³利加乔夫也在政治局内受到了严厉斥责。冲突被暂时性地压制住了。但是，这些争论体现了领导集体对于自由化边界与开放政策逆转可能性的公开对抗，促使冲突从制度向街头进一步转移。

1988 年 6 月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前后是苏联抗争政治（*contentions politics*）扩散过程的一个转折点。大会介绍了对政治改革的过高期望，自由化受到党内保守派的严重威胁，强硬派因利加乔夫被斥责而受到攻击——这些都激发了挑战群体以更大的努力来挑战党的官僚体制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大会代表团的选举（各地均在 5、6 月举行）和地方党魁试图控制大会的努力（因为他们通常都这样过）促使苏联不同地区都产生了新的社会运动组织——“支持改革人民阵线”（*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Support of Perestroika*）。这些所谓的“非正式”团体产生自地方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与本地党组织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还因为过去一年半中政治话语和行动的新的可能性而不断政治化。最初，这些战线主要关注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的选举过程。一些地方允许大会代表的公开提名，但这在绝大多数地方仍受到地方党的机构的控制，而这些地方往往是戈尔巴乔夫的对手集中所在地。这触发了 1988 年 5、6 月发生在苏联不同地区游行示威的高潮。小规模游行示威发生在莫斯科、列宁格勒、基辅、斯维尔德洛夫斯克、鄂木斯克、敖德萨、伊尔库茨克、雅罗斯拉夫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马加丹、古比雪夫和托米斯克。这些活动不仅指责党的地方官员镇压政见不同者，还号召对苏维埃体制进行一次更深入的民主化。同时，在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以及西乌克兰和摩尔多瓦规模相对较小的响应）⁴，因抗议代表选举过程而产生的人民阵线迅速发展成为大规模的分裂主义事件。我会在第 4 章具体讨论认同动员时，深入探究 1988 年夏、秋波罗的海分裂主义事件的发生。而我们也会看到，代表选举过程而出现的的机会感以及随党代会而来的气氛在波罗的海民族主义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本身，包括其中随心所欲的争论以及激进的政治改革的开始——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所说——是“改革不可逆转的真正转折点”。⁵在此，戈尔巴乔夫还提出了“法

¹ *Sovetskaia Rossiia*, March 13, 1988, p.3.

² Gorbachev, *Zbign' i reformy*, vol.1, pp.381-90; Cherniaev, *Sbest' let*, pp.203-8, 211-13.

³ *Pravda*, April 5, 1988, p.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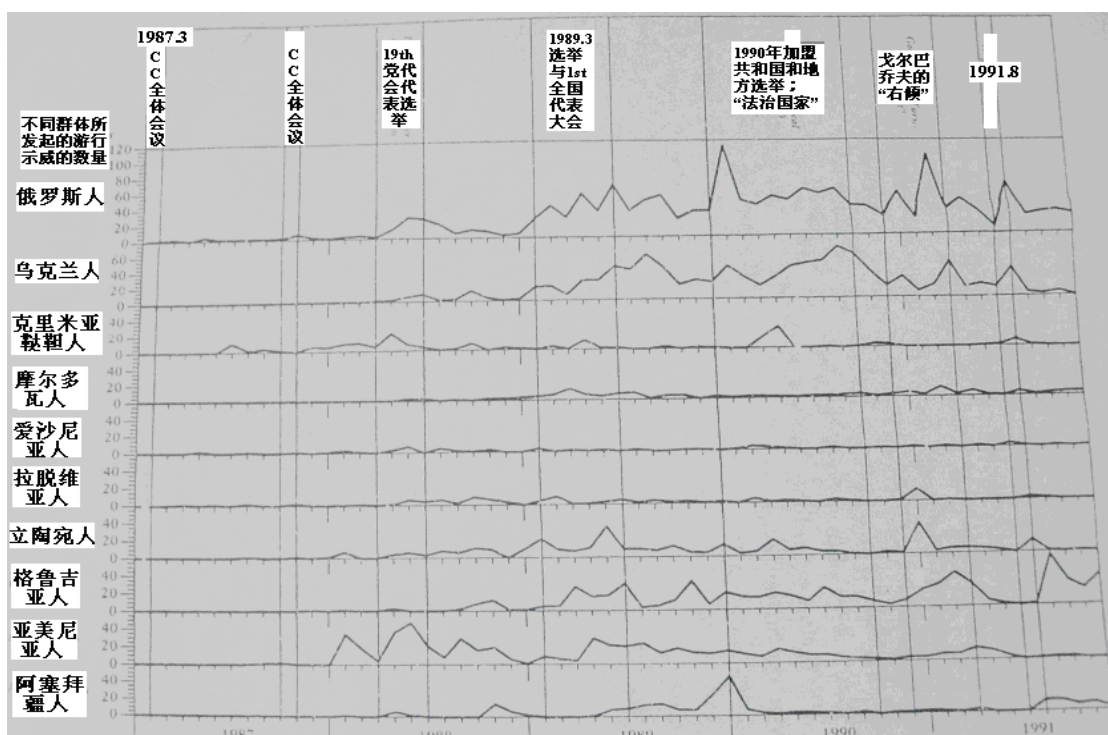
⁴ On the birth of Rukh in L'vov at the time and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Nineteenth Party Conference, see *Arkhiv samizdata*, no. 37, July 29, 1988(AS No.6363), pp. 1-2. On the birth of “The Democratic Movement in Support of Perestroika” in Kishinev in summer 1988 as “an expression of frustration with the obstruction of perestroika by the republic’s bureaucracy,” see *Report on the USSR*, vol. 1, no. 8 (February 24, 1989), pp.30-35.

⁵ Gorbachev, *Zbign' i reformy*, vol. 1, p.364.



治国家” (*pravovoe gosudarstvo*) 这一概念，旨在使得从上到下全体官员都受制于法律。所有党委书记应当通过选举产生而非上级任命；而且，他们还将同时担任地方苏维埃政府的首脑。

表 2.4. 苏联 10 个主要民族进行重大的机构改革和抗议动员的时期，1987-91



如果落选地方政府首脑，他们也会被要求辞去党的职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是这种权力关系的改变在苏联政治的最高层面。作为一个新的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部分成员将由竞争选举产生。而中央委员会，作为历任苏维埃领导人遥控社会的机构，也从科层制分支部门改组为 6 个下属委员会。这是一次旨在改变党的官僚主义的改革，使党从强制者转型成为共意性建设者 (consensus builder)。所谓的“政治”方法由此被“行政指挥” (command-administrative) 方法所取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会议进程由保守力量所控制，而他们一直严厉指责新闻界过度开放了。但是，由于公开播出激烈冲突并牵涉到国家的政治精英，为期 4 天的会议大大拓宽了其争论的范围。免除停滞时期政治局一些保守派成员 (包括主席安德烈·葛罗米柯 Andrei Gromyko) 职位的要求，以及对斯大林主义和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指责、对部分代表受贿的公开指控以及利加乔夫与叶利钦之间的直接对抗 (随后远离了政党的层面，业已成为反对党政机构的一个象征) 相互交织。在所有这些方面，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标志着一通向公开政治竞争的明确道路，而这激发了政治表达以曾经不可想象的方式体现出来。正如一位积极分子后来回忆它所营造的领导者关于新的“非正式”组织的气氛时所说，“当时的情形看似支持最激进的事业”，甚至信心也“在快速而容易的成功中”得到了加强。¹

在第 19 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之后，挑战苏维埃政权的尝试发展迅速，并在多个群体中扩散，赋予了事件一种真正的潮流般特征。图 2.4 是对活跃在开放早期 10 个民族抗议行动发展情况的时效分析，并且将这些行动置于同一时期许多重要的体制改革的背景之中。上图体现的非常明显：在开放早期，国家制度背景下的转型在形塑动员中起到了关键性作用。1987 年间断而分散的动员让路于 1988 年上半年动员在多群体中日益增多的趋势。其中，1988 年 5、6 月显然是许多民族主义抗议行动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分界点，特别是在波罗的海人、格鲁吉亚人、摩尔达维亚人、

¹ Boris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A Short Chronicle* (London: Verso, 1990), pp.7-8.

阿塞拜疆人、乌克兰人和俄罗斯人之中。因此，应第 19 次党代会的开放政策，抗议行动在多群体中同时增多了。

以此为开端，挑战群体实现了信息、手册、技能、挑战模式以及动员架构的普遍共享。1988 年 6 月，来自于乌克兰、亚美尼亚、格鲁吉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爱沙尼亚持不同政见的民族主义运动的代表们开始相互接触，并建立了一个协调委员会。¹1988 年夏、秋，沿袭波罗的海模式的人民阵线扩展至苏联绝大部分地区。1988 年 8 月，苏联新成立的人民阵线的代表们汇聚在雅尔塔和列宁格勒来探讨他们之间合作的可能性。²这些群体频繁借用波罗的海成功案例中的抗争策略，将游行示威视作舆论动员和破坏常规政治的主要方式。他们还充分利用波罗的海人民阵线的纲领性文件，将其所提出的反帝国范例，连同具体的要求和目标一起，都纳入自己的方案。正如一位爱沙尼亚积极分子 1988 年 9 月所说，对人民阵线的兴趣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从里加到新西伯利亚人民民主运动的代表们都来学习我们的经验。”³甚至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之前，组织还接待了来自于乌兹别克斯坦、亚美尼亚、摩尔达维亚、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外国”代表团。而摩尔达维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和俄罗斯新社会运动的代表们则出席了成立大会。⁴1989 年 1 月，阿塞拜疆出现了民族主义方案和传单。这些资料直接拷贝自爱沙尼亚人民阵线的文件，而且又是在亚美尼亚获得的。⁵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吉达斯·布拉藻斯卡斯 (Algirdas Brazauskas) 后来回忆，1989 年他常常受到莫斯科方面的质询：“你们在做什么？你们想摧毁苏联吗？萨尤迪斯政府的人正在摩尔达维亚、亚美尼亚、格鲁吉亚等各个地方活动。”⁶民族主义通过以下方式呈现出具体的潮流般形式，即自觉地输出与借用彼此之间的民族主义范例，共享组织资源，挑战群体从彼此行动中寻求启发。苏联的民族主义革命并不是孤立事件，而是跨民族现象，从彼此的行动中获得力量和支持。

但是，表 2.4 也表明，这种互动的、跨族群的民族主义动员潮流直到 1989 年才开始汇聚成一股抗议的洪流。而这也意味着第二次转折点的发生。它促使对政权的挑战迅速扩展至整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其导火线则是一系列制度偶然和确切事件。而所有这些都发生在 5 个月内这样一个高度压缩的时间段内，并对挑战和政权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全国性的影响，包括针对 1989 年 3 月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选举而产生的运动，1989 年 4 月第比利斯大屠杀，1989 年 5 月底 6 月初新立法机构的第一次会议，1989 年 7 月声势浩大的矿工罢工，以及在不同地区同时发生的多次族群暴力事件。这些体制改革或事件基本上改变了政权约束并边缘化挑战的能力；它们也表明，事件本身日渐增强的自主性是动员、扩大化的挑战、对政权日渐增长的不稳定感产生的原因。

作为苏联历史上第一次半竞争性选举，1989 年初的选举活动成为对抗性动员的一个“避雷针”。这一方面是由于党的机构通常采取严厉的手段来控制提名和选举结果，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选举活动促进了支持某一候选人的选举组织和集会的发展。尽管最后仍然是共产党控制了新的立法机构，但它也遭遇了一些屈辱性失败，而进一步动摇了共产党的权威。例如，在波罗的海地区，人民阵线候选人几乎全线胜出。而且，在许多重要的中心城市，甚至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时候，共产党官员也无法获得足够的选票数。共产党所遭受的选举失败使党的许多精英产生了较大的不满。一些人宁愿退休，也不愿意在选举失败后辞职。看起来，共产党的权力日益衰弱，并在不断流失。

第二个发展则是削弱了政权控制街头政治的强制能力：4 月 9 日第比利斯大屠杀。我将在第 7 章具体探讨这些事件及其影响。我们将会看到，镇压抗议者时误用暴力所带来的政治后果使当

¹ *Vesti iz SSSR*, 12-53, 1988; Bohdan Nahaylo, “Representatives of Non-Russian National Movements Establish Coordinating Committee,” *Radio Liberty Research Bulletin*, RL 283/88, June 22, 1988.

² *Vesti iz SSSR*, 16-15, 1988

³ 引自 Nils R. Muiznieks,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 on the Process of Soviet Disintegration,” *Europe-Asia Studies*, vol. 47, no. 1 (1995), pp. 11-15.

⁴ Muiznieks, “The Influence of the Baltic Popular Movements,” p. 8.

⁵ *Bakinskii rabochii*, January 15, 1989, p.2.

⁶ Algirdas Brazauskas, *Lietuviskos skrybybos* (Vilnius: Politika, 1992), pp. 55-56. 我很感谢 Pranas Ciziunas 将立陶宛语翻译成英语。



局在使用武力时不得不有所保留。这也是苏维埃政府有效地保护自身免受街头挑战的能力上的一次转折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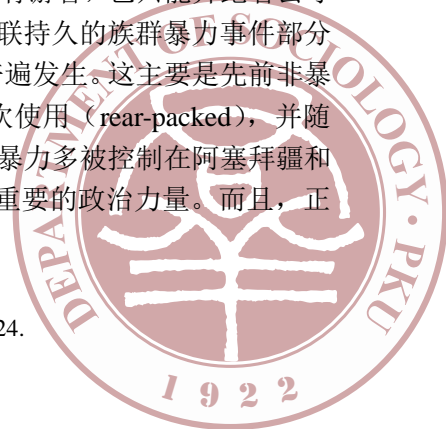
第三，重要的动员由对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预期及其召开所引发。而这主要发生在莫斯科，当然也包括其他地区。立法会议的议程向全国实况直播。这不仅使公众连日来感到惊恐，而且也影响到政权的批判者们——他们将此视为传播自身信息的一个新的讲台。正如戈尔巴乔夫的顾问瓦列里·博尔金(Valery Boldin)在谈论会议期间政治局的氛围时所说，“绝大多数人都意识到一扇门被打开了，而一群乌合之众已经从这个门冲了进来。”¹新成立的地区间代表团，将在俄罗斯、乌克兰、波罗的海和格鲁吉亚独立反抗的代表们联合起来。但是，这一代表团很快就在1990年加盟共和国选举中被废除，历史非常短暂。然而，它依然表明了自由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通过与民族主义运动合作来推进他们在制度环境变化过程中的共同利益时所采取的方式。

但是，直到1989年那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苏联政权才第一次处在摇摇欲坠的边缘。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一直承受着大规模游行示威所带来的煎熬，而且，这一趋势逐渐向乌克兰和摩尔多瓦扩展。事实上，在1989年夏天的事件之后，至少戈尔巴乔夫的一名顾问已经认为苏联的局部分裂——具体来说，即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脱离——已经变得“不可避免”²。随后的几个月间，这一传言在莫斯科愈演愈烈。而在俄罗斯内部，关于中心的普遍态度也在发生重大转变。1989年7月，在西西伯利亚库兹巴斯地区、乌克兰顿巴斯地区以及俄罗斯的成千上万名矿工，因不满于肥皂和其他生活必需品的短缺而进行罢工。他们占领了城镇广场，并要求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及拥有更多对他们自身工作场所的控制权。我将在第8章具体探讨1989年夏天中动员的劳动-经济潮流。从动员周期和民族主义浪潮这一更宏大的背景来看，矿工罢工并不是罢工出现中的主要行动方式。从1987年1月到1989年6月，苏联工业日均有超过28,000,000人参与罢工，其中，绝大多数从大罢工转移到亚美尼亚、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以及波罗的海地区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问题上。而总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也并不认为有必要会见矿工并听从于他们的要求。当然，罢工有助于认识到当前政权日渐增多的问题，但他们的新奇却是基于上述事件所反映出来的工人阶级中的俄罗斯人和俄罗斯化的乌克兰人对苏联政府急剧的不满。高度俄罗斯化的乌克兰矿工本应该成为苏联完整统一最衷心的拥护者。然而，他们最终却是以压倒性的投票结果接受乌克兰独立。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莫斯科方面的政治比较陌生。在俄罗斯内部，工人阶级的反抗给了政权反对者极大的力量，而在当时，反对者几乎全部都是来自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知识分子。在苏联社会中，抗争获得群众支持基础的情景第一次看似可能，而这也激励了俄罗斯“民主人士”更直接地去挑战克林姆林宫的权力。

最终，在1989年夏天，多个暴力冲突在苏联各地爆发。6月，剧烈的族群暴力事件爆发，包括乌兹别克人和麦斯赫持亚土耳其人在费尔干纳盆地(Fergana valley)，哈萨克人和列兹金人在哈萨克石油重地Novyi Uzen'，以及格鲁吉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格鲁吉亚马尔内乌利(Marneuli)地区都有所行动。7月，亚美尼亚人和阿塞拜疆人在哈萨克斯的再次暴力冲突发展至更持久的武装斗争；柯尔克孜人与塔吉克人在奥什山谷(Osh Valley)为争夺土地和水源而进行战斗；阿伯卡茨人和格鲁吉亚人在黑海海岸使用自动化武器进行战斗，而当时尚有游客，也只能奔跑着去寻找掩护。正如我在第6章进行深入探讨的那样，1989年、1990年苏联持久的族群暴力事件部分上是由于当时权威的深入转型和地方政府变身国家在整个苏联境内普遍发生。这主要是先前非暴力动员发展高潮的结果。因此，暴力性族群动员在动员周期中被再次使用(rear-packed)，并随着苏联在制度上的瓦解而走向顶点。在1989年年中以前，民族主义暴力多被控制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境内。1989年夏天过后，民族主义暴力已经发展成为一股重要的政治力量。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它不仅仅是认同的体现，同样也在形塑认同。

¹ Valery Boldin,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p. 224.

² Cherniaev, *Shest' let*, p. 296.



从 1989 年年中到苏联解体，重大的抗议游行示威、罢工和跨族群暴力冲突几乎每天都在这个国家发生。全盟中心 1988 年和 1989 年所做的民意研究调查发现，政治活动的选择度增加了五倍，而共产党和官方工会会议的参与情况减少了一半。¹如果说游行示威和罢工在 1987 年尚属罕见而大胆，那么，到了 1989 年和 1990 年，它们已经成为苏联政治领域常见的组成部分。1989 年 4 月 8 日是臭名昭著的第比利斯大屠杀的前一天，也是大规模示威游行五天以后。在这一天的第比利斯，导游带领游客们来到汇聚了数千名抗议者的城市中心广场，“因为集会已经成为这座城市日常生活的一个方面”。²正如当时一位记者评论道，“罢工集会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³在 1991 年 3 月 28 日发生在莫斯科的大规模集会中，有超过 300,000 人参与，旨在支持鲍里斯·叶利钦，要求戈尔巴乔夫下台。对此，记者们报道说，这类事件是如此常见以至于“那些正在麦当劳餐厅外排队的人，尽管处于事件的中心地带，但在整个游行示威过程中始终都站在原地，坚定不移地等待着他们的汉堡包和巨无霸。”⁴曾经的边缘和异常变得平凡，融入进日常的生活之中。而这正是一个处于转型过程中的世界的体现。

不过，依然有许多人对此无动于衷。除了在时间上受到制度约束和涌现出来的事件的限制，民族主义浪潮在空间上也被结构化了，只是涉及到特定人群而非其他人。近年来所做的诸多调查显示，苏联总人口中的一小部分（部分地方在 11% 至 14% 之间）曾参加过抗议活动。这些年来绝大多数抗议动员往往发生在大城市。尽管在 1989 年苏联总人口中仅有 15% 居住在常住人口超过 1,000,000 的城市，本研究所记载的游行示威有 41% 发生在这类城市，几乎占到近年来所有游行示威参与者总数的 69%。某些地区和少数民族几乎完全没有受到这一波及到苏联其他地区的剧变的影响。我们稍后将会看到，这一变迁告诉我们很多关于形塑民族认同和行动的更广泛的社会力量。然而，在苏联前 55 个较大族群中，只有 7 个没有在这一时期经历过重大的抗议活动（指超过 100 人的游行示威），而有 26 个则发生了超过 20 个重大的游行示威（最少有 100 名参与者）。在这些年间，许多共和国（特别是在亚美尼亚、阿塞拜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摩尔多瓦）都发生过抗议行动（有时，在多个场所）。其中，在年龄在 15 到 69 岁之间（无论族群）的城市居民中，超过三分之一（在一些案例中，超过三分之二）参与到抗议行动。⁵在这里，作为想象出来的民族，这群人已经接近了所声称的共同体实际维度。

人口中的特定群体在这几年间不断被动员起来。社会学家在调查了 446 名参与过 1990 年 2 月 25 日由莫斯科选民协会（Moscow Association of Voters）（会员多达 250,000 人）发起的选举集会和游行示威运动的被访者，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参加过往年所举行的其他游行示威。第二年在莫斯科所做的一个类似调查，访问了 1991 年 3 月 28 日由民主俄罗斯（Democratic Russia）所组织的集会（规模多达 300,000 人）中的 891 参与者，发现超过 70% 的人参加过之前的游行示威，而有 63% 参加了至少 3 次。⁶因此，我们看到，在 1990 年，示威游行在苏联许多地区已经变得常规化，以至于社会特定领域内的大量人群反复参与其中。至少从微观层面上来说，游行示威已经成为处理政治冲突的一种常规手段。事实上，在 1991 年 3 月一项涉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RSFSR）24 个省份和共和国、16,857 名居民的调查发现，在解决社会或政治难题时，18.9% 的人倾向于将游行示威活动作为解决方式，而非其他参与形式。⁷

抗议坚定分子出现在一个时间相对压缩的阶段，以及抗议活动曾是罕见而常被压制的国家之

¹ Yu. A. Levada, *Est' mnenie! Itogi sotsiologicheskogo oprosa* (Moscow: Progress, 1990), p. 284.

² Anatolii Sobchak, *Tbilisskii izlom, ili Krovavoe voskresen'e 1989 goda* (Moscow: Sretenie, 1993), p. 106.

³ *Rabochaia tribuna*, March 10, 1990, p. 1.

⁴ Radios Maiak, in *FBIS*, March 29, 1991, p. 57.

⁵ 如果我们可以得到每一个族群和城市有关年龄的具体数据，它们无疑会表明，在一些地方，绝大多数潜在参与者都曾参与过抗议活动。

⁶ 这些未公开的调查结果由全盟中心民意研究项目中的尤里·勒瓦达（Yuri Levada）和阿列克谢·莱文森（Aleksii Levinson）提供。

⁷ *Rezultaty sotsiologicheskogo issledovaniia "Sotsial'no-aktivnye sily Rossii: Usloviia i puti ikh konsolidatsii"* (Moscow: Institut sotsial'nykh i politicheskikh tekhnologii, 1991), p. 72.



中。上述现象反映出，变化了的制度约束和事件带来了意识上的巨大改变。在短时期内，受其他群体案例的影响，那些未曾打算抗议的人也开始将这一行动方式视为正常的，甚至是更可取的。正如一位作家在描述 1989 年矿工罢工时所写，“许多矿工说，在这个夏天以前，‘罢工’这个词甚至都不曾出现在他们的语言中”。¹成功的抗议不仅使人们更倾向于运动，而且也成为一股改变认同的力量。鲍里斯·卡加尔利茨基（Boris Kagarlitsky）指出，在 1989 年 5 月苏联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时，莫斯科人民阵线组织的一次成功的抗议运动对后来的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大批人加入了莫斯科人民阵线的队伍。不过，他们是受我们活动成效的吸引而加入，并非是我们的意识形态。”²甚至连孩子们也开始模仿他们父母的争议性行为。在埃里温，数百名亚美尼亚人学童大规模参与到焚烧领袖的头巾以及共青团员资格即是一个证明。³在图库姆斯一座小镇上，拉脱维亚人学童宣布罢课，以抗议他们学校所开展的服务于苏联军队的义务军事训练。⁴在明斯克，白俄罗斯人学童高喊着“改革”和“民主”的口号，在学校礼堂前静坐罢课，要求学生应当拥有学校理事会的主要发言权，包括他们有权选择老师，以及学校行政部门应当被解散。⁵简而言之，从 1989 年到 1991 年，苏联社会经历了阿里斯蒂德·佐尔贝格（Aristide Zolberg）所谓的一个长时期的“疯狂时刻”⁶，其间，社会秩序完全倒转，政治生活的常规范围扩大，个人的忠诚和热爱无所寄托。在这样一个凝缩而“加厚”的历史时期，曾经非常规和看似不可能的事情都变得平常了。

对制度的动员影响

我们已经看到，制度偶然事件是引发苏联动员周期和民族主义浪潮的关键政治因素。但是浪潮反过来也对政治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去改变允许这一情况首先发生的条件的能力也标志着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增长的自治权与独立的因果权力。

浪潮通过多种方式来影响制度。“加厚”历史阶段的特征之一就是事件的发展速度往往超过制度的变化和领导人的认知（并不包括外部观察者）。正如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7 月在一次针对共产党社会角色的特别会议上描述“问题的本质”时所说，“重建政党必将大幅落后于社会发展的进程。”⁷当然，戈尔巴乔夫应当对此负重要责任。叶戈尔·利加乔夫指出，“对事件反应太晚或太慢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对此，我们有太多的例子，从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立陶宛事件到价格改革以及应对危机时所采取的经济和财政措施……事实上，具体实际行动太晚已经成为改革的一种象征。”⁸但并不仅仅是戈尔巴乔夫没有把握到正在发生的变迁的速度。事件发展的速度远远超过制度做出及时反映的能力。戈尔巴乔夫顾问之一瓦列里·博尔金后来提到：“我们常常看到一些原本在三五年前有用的提案。”⁹戈尔巴乔夫的新闻秘书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指出，戈尔巴乔夫和他的政府是如此繁忙，以至于他们几乎没有时间根据变化了的环境去重新来思考他们的政治假定。¹⁰

当然，许多政策领域的确如此。但考虑到民族主义浪潮及其所带来的变化，这在民族主义问题上显得极其离谱。戈尔巴乔夫及其改革团队最初设想将在改革的第二阶段，即中央政治体制改

¹ Lewis H. Siegelbaum, “Behind the Soviet Miners’ Strike,” *The Nation*, October 23, 1989, p. 451.

² Kagarlitsky, *Farewell Perestroika*, p. 140.

³ *Ekspress khronika*, May 22, 1990.

⁴ *Atmoda*, December 18, 1989, p. 7.

⁵ *Sovetskaia Belorussia*, January 22, 1989, p.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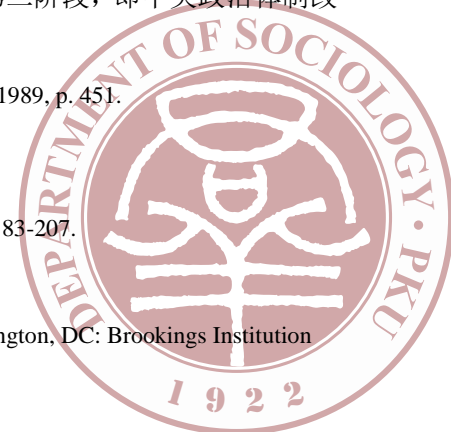
⁶ Aristide R. Zolberg, “Moment of Madness,”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2(1972), pp. 183-207.

⁷ *Pravda*, July 19, 1989, p. 1.

⁸ Ligachev, *Inside Gorbachev’s Kremlin*, p. 128.

⁹ Boldin, *Ten Years That Shook the World*, p. 147.

¹⁰ See Jerry Hough, *Democratization and Revolution in the USSR, 1985-1991*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1997), p. 206.



革以后，来解决中心-边缘关系的问题。¹但是民族主义问题却将它自身纳入政治议程。在 1988 年 7 月，大规模民族主义动员还仅仅发生在亚美尼亚和爱沙尼亚，而且最具反抗性的积极分子也认为分裂并不现实。此时，戈尔巴乔夫要求提出一些限制中央体制对加盟共和国的权力的提案。为此，定于 1989 年 6 月召开一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²但在当时，会议的准备已经开始，而街头政治发展势头良好，完全超越了任何人哪怕只是一瞬间的想象。会议被数次推迟，最终在 1989 年 9 月召开。那时，大规模分离主义动员已经在波罗的海地区、格鲁吉亚和西乌克兰爆发，并开始扩展至亚美尼亚、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根据这次会议所传达的“一个强大中心和诸多强大的共和国”这一准则而来的新联邦主义思想，对当时急剧变化的形势基本上毫无作用，甚至还具有煽动性。1989 年底，戈尔巴乔夫继续坚持一种错误认识，即认为共和国独立的财政预算（*khozrashchet*，地区独立会计，或共和国层面上的经济去中心化）将令波罗的海人民满意，尽管这一要求早在 1989 年春便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它是波罗的海人民在 1987 年提出来的，主要是作为检验可能性范围的一种方式。³1989 年 7 月，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dze）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说：

如果我们两年前讨论（联邦的）转型，可能会很有意思。但目前这已经过时了。一些努力设定的边界已经不再是边界了。在心理上，这会产生反作用。平常之事被反复提出，似乎它们是创新和发现。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加盟共和国的权利问题上。⁴

简而言之，事件的速度和发展远远超过了体制的各项工作。

对戈尔巴乔夫来说，这一点也很明显。在 1990 年 3 月，直至东欧革命爆发，立陶宛共产党退出苏联共产党（CPSU），第二次人民代表大会宣告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的秘密协议无效，波罗的海各加盟共和国选举活动使分离主义运动握有权力这一系列事件发生以后，戈尔巴乔夫才公开承认他 1989 年 9 月提出的联邦复兴计划已经“过时了”。⁵他放弃了“一个强大的中心和诸多强大的共和国”的原则，转而支持一种彻底去中心化的联邦主义的想法，并主张重新协商 1922 年苏联制定的联盟条约。然而，在这时，许多共和国的态度已经转变成仅仅赞同一种同盟协定，其他共和国却连这个都不同意，而坚持彻底的独立。总理雷日科夫指出，在 1990 年底，“没有人需要任何形式的中心”。⁶事件又一次超越了制度所做回应的能力。

至 1990 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筋疲力尽，越来越无法触及到他身边的政治事实。他坚持拒绝承认波罗的海地区要求独立这一事件的严重性，坚称波罗的海人在经济上无法脱离苏联独立生存。即使在 1990 年，立陶宛政府宣布独立之后，他更愿意视之为一种“象征性”姿态，相信波罗的海人最终将会接受在新苏联拥有一些“特殊的地位”。原因很简单，“如果离开，他们将会在经济上走向衰亡。”⁷正如他 1990 年 11 月对赫然穆特·科尔（Helmut Kohl）所说：

如今，民族主义者感到他们的权力正在不断衰弱。在立陶宛，他们已经认识到兰茨贝吉斯路线（*Landsbergis' line*）只会走向死胡同。波罗的海地区三个加盟共和国的政府首脑要么坐在雷日科夫领导的苏联部长理事会上，要么在 Masliukov 的国家计划委员会中。他们会为了获得本国 1992 年经济需要而一起工作。当然，参与示威游行很好，但无论如何，一个人需要先生存下来！⁸

同样，对于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戈尔巴乔夫认为“人民拥有强烈的跨民族主义忠诚”，因

¹ Medvedev, *V komande Gorbacheva*, p.83.

²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399; Cherniaev, *Shest' let*, p. 242.

³ *Soiuz možno bylo*, pp. 75.

⁴ *Soiuz možno bylo*, pp. 62.

⁵ *Soiuz možno bylo*, p.95.

⁶ Ryzhkov, *Perestroika: Istoriia predatel'stv*, p. 19. See Gail Lapidus, "Gorbachev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Restructuring the Soviet Federation," *Soviet Economy*, valso ol. 5, no.3 (1989), pp.201-50.

⁷ Cherniaev, *Shest' let*, pp. 246-51;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p. 511, 524-25.

⁸ Cherniaev, *Shest' let*, pp. 386-387; 如 Cherniaev 所说，戈尔巴乔夫“编造了一个自我抚慰但脱离事实的结论”——这可以从他 1990-91 年的行动中看出其日益缺乏事实的端倪。



此广大乌克兰人民将会对分裂要求置之不理。正如戈尔巴乔夫后来承认的那样，他过于轻视了分裂主义思想有可能在持久对抗、与中心的疏远、其他案例的共同影响之下扩散的潜力。¹例如，在 1989 年 2 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戈尔巴乔夫向他的同僚们剖析了为什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在性质上不同于非斯拉夫共和国以及它们不可能屈从于分裂主义思想的全部结构性原因：

在这里，一切都与俄罗斯紧密关联。数百万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居住和工作在各自共和国以外。他们不仅在他们自己的共和国内，而且在社会生活、生产、党政机关和文化领域内都占据了显著的、权威性的地位。大多数人都是这样。鉴于他们与俄罗斯人相似的历史根源和语言……，通常很难确定某人究竟是俄罗斯人、乌克兰人还是白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本身并不想让他们孩子上本族语言的学校，特别是在大城市中。²

事后，我们可以轻易地因苏联解体和有可能改变最终结果的决定而批评戈尔巴乔夫。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海外，许多著作都做了这样的分析。许多讨论都低估了 1989-90 年民族主义所具有的潮流般力量以及按现有事件的发展速度去推进体制改革时所遇到的困难，特别是当制度本身正在重组之中或正是争端中心之时。鉴于民族主义浪潮的出现，不同的领导是否能够成功地驾驭事件并使之朝着一个可行的制度结果发展，我们对此还不甚明了。体制改革导致了民族主义浪潮的产生；但是，它远远不及事件那令人炫目的发展速度。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政策常常受到党内保守派的尖锐指责，但正如瓦迪姆·韦杰夫（Vadim Medvedev）所指出的那样，事实上，每一个由中央委员会一致投票决定的决议最终都是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路线。³如果戈尔巴乔夫 1989 年 4 月下台（当时，他的一些批评者第一次提出这个提议）而另一位领导者上台，开放政策还有可能被中止。但这是否能够成功地遏制跨族群反抗浪潮，我们依旧无法确定。况且，戈尔巴乔夫的免职本身也有可能激起大量抗议活动。正如我们将在第 7 章看到的那样，到 1989 年年中，暴力镇压导致了自身的功能障碍，加深了中央体制的瓦解，并推动了分裂进程不断向前发展。在 1988 年末、1989 年初，即第比利斯事件以及大规模争端广泛扩展发生之前，苏联的民族主义浪潮还有可能因镇压而停止。但是，成功镇压浪潮的可能性比绝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应当还可以时大大降低了，而这有可能已经迟了几个月。此外，在 1988 年秋之前，这一浪潮对苏维埃国家生存的危害尚不明显。直到 1988 年末、1989 年初，民族分裂主义才被中央精英视为对国家生存的危险，但不久之后，第比利斯大屠杀的后果、分裂主义反抗在地域上日渐扩展以及多个暴力冲突的兴起都使苏维埃政府作出一个强有力的回应变得更加困难。

要不，就像一些人（包括戈尔巴乔夫的主要顾问之一安纳托利·切尔亚耶夫 Anatolii Cherniaev）所提出的那样，民族主义浪潮可以通过招安策略而终止：允许波罗的海人在 1989 年年中较早时期脱离苏联，因为当时分离主义思想还没有在其他地方形成；澄清并强化 1939-40 年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土地合并与苏联其他地区之间的差异。但是，切尔亚耶夫也指出，戈尔巴乔夫不会允许自己同意波罗的海脱离苏联，因为他担心这对生活在波罗的海地区的俄罗斯人的影响，可能会引起俄罗斯境内俄罗斯人的集体反对，特别是对其他地区分裂主义挑战的激励。⁴指引苏维埃国家走出民族主义浪潮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在民族主义浪潮不断变化的政治局面中，如果在错误的时空背景或方式下，那些旨在终止挑战的行动就很有可能带来反面效果，而且，民族主义所造成的危险意识本身就是一个变量。从这个方面来说，戈尔巴乔夫的批评者们关于避免苏联解体的举措的论断，只有在考虑到这一潮流的时代背景之下才能得到公平评判。具体来说，就是制度本身是如何被不断涌现出来的争端所改变，以及制度意识和行动是怎样落后于事件的不断

¹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14.

² *Spiuz možno bylo*, p.47.

³ Gorbachev, *Zhizn' i reformy*, vol. 1, p. 514.

⁴ Cherniaev, *Shset' let*, pp. 325, 339, 374. 写于 1989 年，我做了类似的评论。见 Mark Beissinger 和 Lubomyr Hajda, "Nationalism and Reform in Soviet Politics," in Lubomyr and Mark Beissinger, eds. *The Nationalism Factor in Soviet Politics and Societ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0), p. 320.



冲击。

这一浪潮在苏维埃体制中产生了如此之多的混乱和分歧，使得找到解决挑战以维持苏联完整的制度性方法更为困难。如第7章所讨论的那样，不仅警察和武装力量因这一突发的动乱而元气大伤、士气低落，而且党和国家的官僚体制的情形更为严重。从开放政策一开始，党的领导集体就已经分裂成为“左”、“右”两个对立的派别。在当时的惯用法中，左派旨在以更快的速度推进自由化，而右派关注自由化所带来的不稳定后果并支持俄罗斯民族主义。当1989年国家的未来受到质疑时，派别之分变得更为明显，而且，像总理雷日科夫等中间派也越来越倾向于站在反对戈尔巴乔夫的一方。密谋推翻戈尔巴乔夫的谣言广为流传。所有这些都使得更难对这一浪潮作出一个连贯性的回应。

这一浪潮导致苏维埃机构产生巨大的分歧。这主要是因为国家和社会之间界限模糊，而战线也频繁越过国家—社会之间的鸿沟。允许街头挑战增加的首要原因就是在国家机构内存在这些人的支持者。例如，阿塞拜疆人与亚美尼亚人关于卡拉巴赫的冲突并不是反对者与政府机构之间的一次简单对抗。两国的非官方运动均得到了党和国家的支持。在1989年阿塞拜疆，政府官员及其合作企业将地方性仓储的食物、毛毯、帐篷（包括成千上万的卢布）分发给巴库夜间非法游行示威活动的参与者。据阿塞拜疆共产党第一书记所说，某一政府官员和机构“本身就是动乱的组织者”。¹由于政府官员中有“叛徒”，在1989年4月第比利斯所召开的政府与党之间的封闭式会议中，关于党的领导集体打算终止游行示威的信息才迅速为大众所知。正如后来对这些事件的深入调查所反映的那样，“通过全面考察，党的中央委员会和格鲁吉亚政府中有大量游行示威者的告密者和支持者”。²尽管党的地方领导集体最初对此持敌对态度，但波罗的海三国的人民阵线组织都得到了本国党政官员的重要支持，其中的一些人后来还成为了这些组织的领导人。1988年7月，拉脱维亚共和国抗议的第一次重要高潮期间，里加市党委书记A. P. 克劳森（A. P. Klautsen）指出，拉脱维亚共产党看起来已经“转入地下”——它由群众运动领导而非领导它们，并在有关国家和意识形态的立场问题上因严重的分歧而深受重创。³

共产党普通成员更是受到了这一运动的巨大压力。近年来，党员仅占苏联全体成年人口的11%，但是他们却提供了大量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在爱沙尼亚，人民阵线106名领导集体成员近一半是共产党员。在拉脱维亚，人民阵线成立大会参与者中，有30%是共产党员，而在国际阵线（Interfront）成立大会中，超过一半的代表是共产党员。国际战线这一运动发起于1989年，旨在保护拉脱维亚境内非拉脱维亚人的权利。在1989年9月乌克兰人民阵线（Rukh）成立大会1109名代表中，有228人（21%）是共产党员，而在大会选举产生的乌克兰人民阵线执行秘书处的10名成员中，4人是共产党员。同样，成立于1988年10月的白俄罗斯人民阵线最初组织委员会的35成员中，三分之一的人是共产党员。⁴一项对1990年2月25日发生在莫斯科游行示威运动参与者所做的调查显示，在那天大声疾呼反对共产党政治专政的人群中，实际上有22%是共产党员。⁵正如一次群众会议的宣传单上幽默地宣称“苏联共产党万岁——所有反对派运动领导者的锻炉！”⁶

显然，戈尔巴乔夫在党内所推行的改革导致了严重的制度混乱和动荡，并促使了街头的挑战与倒戈。他的改革主要包括：1988年2月（浪潮爆发之前）得出党无法领导改革这一论断，1988

¹ *Bakinskii rabochii*, January 15, 1989, p.1.

² Sobchak, *Tbilisskii izlom*, pp.105-6, 127, 133.

³ *Sovetskaia Latvii*, January 8, 1989, p.2.

⁴ 数据来源: *Sovetskaia Estoniia*, January 14, 1989, p.3; *FBIS*, October 14, 1988, p.49; *Sovetskaia Latvii*, January 26, 1989, p.1; *Golos*, no.4, September 17, 1989, p.2; *Tartuskii kur'er*, October 15-31, 1989, p.7; *Atmoda*, October 16, 1989, p.6; *Golos*, no.5, October 1, 1989, p.2; *Belorusskaia tribuna*, no.3, 1989, p.1.

⁵ *Demokraticbeskaia platforma*, June 1990, p.1.

⁶ *Rossiiskaia gazeta*, July 25, 1991, p.2.

⁷ Gorbachev, *Zbign' i reformy*, vol.1, pp. 413-14.



年7月在党内引入竞选机制，1988年9月精简党的机构，1989年末在苏联政府中设立一个新的总统职位以此加强党的权力。这并不是官僚们根据自我偏好挪用国家资源，而是在多元背景下街头政治与民族主义思想的吸引力远远超过了弱势官僚体制的制度连贯性。正如我们早前所谈到的，1989年、1990年党和国家组织中竞选机制的引入更是加速了许多地区的动员进程。这不仅进一步破坏了党的纪律，而且也导致党与一个日益能动的社会相分离。例如，在乌克兰，许多党的地方官员扬言要辞职，而非角逐竞选。因为后者更有可能面对失败。对于其他人来说，竞选不可避免地使其更关注底层的要求而非党的高层的规训。正如基辅第一书记常常抱怨的那样，“一些共产党员代表候选人一心追求欢迎度而不考虑党的章程、党的纪律或党的行为准则……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同时却又对其泼脏水。无论从那种角度来说，这都是不道德的、没有操守的，或者客气点儿来说，是不光彩的。”¹1990年底，立陶宛共产党和爱沙尼亚共产党宣布脱离了苏联共产党。而拉脱维亚共产党只是在名义上保持到几乎所有党员脱党并另组新党之时。尽管戈尔巴乔夫最初反对政党联邦化这一想法，但是到1990年春、夏之时，为了回应各个加盟共和国和地区的制度转型情形，政党联邦化的压力不断积聚。1990年7月第21次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出台的新规定赋予了各个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自治”地位；同时，也规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第一书记自然当选政治局成员，而将党的领导组织转化为地区代表主体。

许多动员目标是将这一影响类型运用于机构及其领导集体之上，即改变机构行为的长期模式，促使机构按照有助于运动目标的方式运行，并最终获取它们的权威和权力。地方党组织受到斯库拉（Scylla）和卡律布狄斯（Charybdis）的同时影响。其中，斯库拉通过街头政治的作用使地方党组织秩序松散，从而将它们与其所统治的社会分离开来；卡律布狄斯则试图通过他们自身的参与而影响运动的发展，并且在这一过程中逐渐掌握运动的主导权。作为街头政治的拉力，共产党连续受到的交叉压力在1989年8月拉脱维亚共产党第一书记那里得到了很好总结：

一些人声称“在阵线中反思共产党员”。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如果这样做的话，党就被剥夺了与人民大众奋斗在一起的可能性。而其他则相信唯一的“纯粹的共产党员”是那些工作在阵线中、本身支持阵线的人。实质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导致作为一个群众政治组织的党不断走向瓦解。²

在一些个案中，成功的民族主义动员带来了地方共产党领导集体的迅速合作。立陶宛共产党第一书记阿尔吉尔达·布拉藻斯卡斯（Algridas Brazauskas）正是上述结果的例证。他在1989年9月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说：“获得群众信任的唯一途径是要牢记人民的期望与利益，并为此采取激进而果断的政治步骤。因此，我们所熟知的口号‘党的计划就是人民的计划！’如今已变成‘人民的计划就是党的计划！’”³在一些情况下，作为街头政治兴起的结果，党遭受了几乎彻底的体制崩溃，比如1989年4月大屠杀后的格鲁吉亚共产党。

一位政府官员指出，在1990年的许多地区，“‘会议’法案已经取代了‘电话’法案”⁴。所刊登的一则轶事——发生在伏尔加格勒市共和国和地方选举活动高潮时的一件事——很好地反映了当时在俄罗斯许多城市出现的权威的争议性与不确定性路线：

周一早晨，一位中年男子走进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大厦。他环视四周，向遇到的第一个人问到：“同志，哪里是你们主席的办公室？”“在第三层。你有什么问题吗？”“我没什么问题，”那个男人答到，“我是来上班的。就在昨天的游行示威中，我刚刚当选了省苏维埃执行委员主席。”⁵

¹ *Pravda Ukrainy*, May 18, 1989, p.3.

² *Sovetskaia Latvija*, August 11, 1989, p.2.

³ *FBIS*, September 22, 1989, p.45.

⁴ *Pravitel'stvennyi vestnik*, no.29 (July 1990), p.12. “电话”法案是当时被广泛使用的一个短语，用来描述政党机构在传统上是如何在幕后操纵法律制度的。

⁵ *Pravda*, February 17, 1990, p.3.

